

中国工人出版社

# 石油滚滚见太阳

www.duxiu.com

石油滚滚见太阳

——大庆工人家史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625 字数 80,000

1977年9月第1版 1977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71·253 定价：0.35元

#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工业学大庆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  
大庆红旗。

华主席四月二十日给  
大庆油田的亲笔题词

## 前 言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经常开展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回忆对比活动,是大庆油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一个有效办法,也是大庆油田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好传统。

在石油大会战初期,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趁我国遇到自然灾害和因苏修叛徒集团进行破坏国民经济出现

时代，为毛主席争了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了光。

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庆党委在认真学习党的“十大”文件的基础上，遵照毛主席关于“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的教导，用“四对比、五算帐”的方式，发动群众，开展“忆苦批林”。党委常委带头忆苦批林。在党委的领导下，全油田八万多人作了系统的忆苦批林发言，控诉了地主、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揭批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并且发动群众，大搞社会调查，从班组到机关，普遍建立了新旧社会“两本帐”，一本是旧社会劳动人民当牛做马的苦情帐，一本是新社会翻身作主的幸福帐。这样一忆一比一批，大大激发了广大职工、家属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无比仇恨，对新社会的无比热爱，有力地推动了油田建设的向前发展。就原油产量来说，今天的大庆已发展成为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六个大庆。

在举国上下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大喜日子里，大庆油田沸腾了。广大职工和家属对“四人帮”的愤恨，象燃烧着的天然气流从地下喷射出来一样迸发了出来。在大庆党委的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忆苦思甜、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老工人重温新旧社会“两本帐”，新工人也问家史，写家史，建立“两本帐”。大家象控诉地主、资本家、蒋介石那样，控诉“四人帮”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反革命罪行。大家含着激动的

热泪说：如果让“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我们石油工人扶刹把的手就要重新拿起讨饭棍，八米钻台就要变成断头台，泥浆池就要变成万人坑！我们一定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树立，敬爱的周总理精心培育的大庆红旗高高举起，一直扛到共产主义！

《石油滚滚见太阳》是从大庆工人和家属回忆对比的材料中整理选编而成的。编入本书的九篇家史，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石油工人及其家属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和反抗斗争，热情地歌颂了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大庆工人和家属翻身不忘阶级苦，牢记新旧社会“两本帐”，为社会主义建设奋发大干的高度思想觉悟和英雄事迹。“铁人”王进喜同志的文章，是一九六六年他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摘要。这篇报告，反映了王进喜同志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和他在党的培养下的战斗历程，充满了大庆人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作风，因此也收入本书。

本书编写工作在大庆党委政治部的领导下，得到大庆党委政治部宣传处、各指挥部党委和广大职工、家属的大力协助和热情支持，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

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

# 目 录

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 为无产阶级事业 奋斗一辈子	
——“铁人”王进喜同志一九六六年在全国工业 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扩 大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	1
石油工人经历的两重天	
——大庆油田会战老标兵薛国邦的家史 .....	24
三代石油工人的悲欢	
——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老工人王天贵讲家史 .....	42
石油滚滚见太阳	
——大庆油田勘探指挥部老工人王惠德讲家史 .....	55
永不忘本干革命	
——大庆石油化工总厂“一心为公的好干部” 李景荣的家史 .....	71
学院的新主人	
——大庆石油学院马列主义学习班党支部书记 管恩海讲家史 .....	84

## 喜看油田翻波浪

——大庆油田家属标兵薛桂芳讲家史 ……………98

## 童养媳顶起半边天

——大庆油田采油六部一大队家属陈福光讲家史 …… 112

## 工农的好后代

——大庆油田“身残志坚的好青年”张秋银的家史 …… 121

## 爸爸寄来的活教材

——大庆油田采油四部青年工人任军谈家史 …………… 133

# 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 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一辈子

——“铁人”王进喜同志一九六六年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新华社编者按：在波澜壮阔的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高潮中，本社今天重新播发王进喜同志一九六六年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摘要)。重读这个报告，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气势磅礴的大庆石油会战的创业年代。报告充满了大庆人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作风，读后使人精神振奋，力量倍增。

王进喜同志是大庆工人的优秀代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他“心里想的，嘴上说的，手里干的，和毛主席教导的一个样”，是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他坚持不懈地“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修正主义斗”，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他为革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人”；他“干着社会主义，想着共产主义”，是胸怀远大目标的先锋战士；他“甘愿为党为

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干工作“三老四严”，“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是毛主席提倡的那种老实人；他“当了干部，还是个钻工”，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技术精益求精，努力做到又红又专，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有了以王进喜同志为代表的这样一支反修防修，又红又专，压不倒，摧不垮的铁人式的革命化队伍，有了大庆人的这种革命精神、革命干劲和革命作风，那怕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险的高峰，也能攀登上去。

“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编造种种谣言，恶毒诽谤王进喜同志，妄图以“砍旗先砍扛旗人”的反革命策略，搞垮大庆，砍倒大庆红旗。王进喜同志这个铿锵有力的报告，也是一篇批判“四人帮”的战斗檄文。重读王进喜同志的报告，对照“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鬼蜮伎俩，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四人帮”是全党的死敌，工人阶级的死敌，全国人民的死敌。王进喜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铁人”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我国亿万人民心中。我们一定要以王进喜同志为榜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深揭猛批“四人帮”，更好地完成大治天下的各项战斗任务，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大庆油田的胜利，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是党的总路线的胜利，是大学解放军的结果，是全国各兄弟单位支援

的结果。我在会战中为党做了一点工作，这完全是党的培养，毛主席的教导，群众的帮助。要是没有党，没有群众，我个人算个啥。

我在解放前，连玉门都没有出去过。解放初期，思想觉悟很低，眼光很浅，“井底的蛤蟆只看见碗大的一块天”，只知有碗饭吃，要为党好好工作。经过党的培养教育，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阶级觉悟逐渐提高，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党却给了很大荣誉。我曾出席过甘肃省劳模会和全国群英会，并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眼界扩大了，脑袋瓜也开阔了不少，知道了国内外许多大事情。

## “我们要靠毛主席思想赶快 拿下这个新油田”

一九六〇年三月从玉门到大庆，我是带着一股子气去的。刚解放时，我觉得玉门油矿很大，出油很多，以后听说外国人说我们国家是“贫油国”，我很生气。我就不相信，石油光埋在他们地底下，我们国家这么大的地方，就没有油？外国人还说我们“笨”，我就不相信，天底下只有你外国人聪明？站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是最聪明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我想光生气不行，还得干，我们一定要找到更多的大油田，多打井，快打井，打好井，多出油，同帝国主义较量较量。

一九五九年底，我到北京开会，看到大街上跑的汽车，有的背着个包，我就问别人：“这上边装那个家伙干什么？”人家说那是因为没有汽油，烧的煤气。我一听心里真难受，真急人呀！我们这么个大国，汽车没有汽油烧还得了！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没有油，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再没问！一到休息时候，我就悄悄地躲在一边，心里很别扭，又憋了一股气。我是个石油工人，难道就眼看着让帝国主义看我们的笑话？就在这个会议期间，听说我国发现个大油田，我高兴得都跳了起来，当时就找部里领导，申请到这个新油田工作。那时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大庆，把大油田拿下来，给帝国主义看看，把石油落后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毛主席讲：“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天不怕、地不怕、不怕鬼、不信邪的硬汉子，非要拿下个大大的油田，为党、为中国人民争这口气不可。

开完会回到玉门后，又听说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勾勾搭搭，想用石油卡我们的脖子，想叫我们交出红旗，我们能够这么办吗？绝对不能！我们要靠毛主席思想赶快拿下这个新油田，给党争光，给人民争气。

我们队三十三个人立即坐火车动身去大庆。在火车上我就和大家一起学《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学完就讨论为什么参加会战？有的同志说：“去打井搞油！”我说：“这话也对，也不完全对。”我说我们是去革命！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石油上卡我们，国家没有石油多困难啊！我们一定拿下这个大油田，甩掉石油落后帽子，为全

国人民争口气。

## “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子孙万代负责,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负责”

我深深体会到:我是打井的人,打井没有压力,就是豆腐地层也钻不进去,泥浆泵没有压力,地下岩屑就带不上来,井没有压力,就喷不出油来,人要没有压力就轻飘飘地过去了,就干不出好工作来。有了压力,干出来的工作,就是高水平、高标准的,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

这压力,不是哪个领导给的压力,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自觉自愿的压力。一个革命者,要有责任心,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子孙万代负责,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负责,就应该有压力。没有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分担这个压力。一般的压力还不够,要承担一百吨的压力,一千吨的压力。

到了大庆,那股子高兴劲,使我这个从来没有流过眼泪的人,都高兴得流了眼泪。我激动地说:“这儿就是大油海,这儿就是大油田,摆开战场、甩开钻机干吧!这一下子,可要把石油落后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 “怕不怕艰苦奋斗,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我们当天就奔向目的地。没有房子,就找个破马棚,

三堵破墙四面透风，里面满是马粪，我们打扫了一下，三十个人挤在一起背靠背地过了一夜。有几个人挤的受不住，就抱了一抱草，半夜里摸黑，找了个夹道去睡。第二天醒来一看，还是睡在一口水井边上，地下铺的是冰。这时，有个别的同志就没精神，唉声叹气，说：“这个地方能打井吗？冰天雪地的，没个锅碗盆勺，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想这个工人也是个好工人，来的时候，他几次举拳头，表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现在他动摇了。又一想，这里的确是艰苦，不是一般的艰苦，这个新社会长大的青年人，根本没想到有这么艰苦。但是，不管多艰苦，拿油要紧。于是我就问指导员：“你当了几年解放军，打仗时遇到这么多困难怎么办？是上还是退？我没有打过仗，我想怎么也不能退。”指导员孙永臣说：“绝对不能退！剩下一个人也要上！要顶着打，直到胜利为止。”好，我们两个人的想法一样。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学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搞油是在野外打井，不能把井架安在楼房里，安在城市里，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今后还是这样，这是工作性质所确定的。现在我们少数人的吃苦，能换来多数人的幸福，换来子孙万代的幸福。这就是我们石油工人最大的幸福。

我认为怕不怕艰苦奋斗，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如果不艰苦奋斗，就要贪图享受，就要变质。打几个漂亮仗是不难的，要是做一辈子艰苦的事情，就要不断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自己才能办到。

钻机没到，我们派人去车站打听钻机什么时候到，有的人平井场，作准备，我所关心的是这个地方地层好打不好打，钻井速度快不快。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我就到处了解地层情况和钻井速度，并且组织全队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越学心里越明亮，大家说：拿下大油田，一定会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还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石油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才是最大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就会利用这个缺口，卡我们，封锁我们。上，有困难；不上，就更困难。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坚决战胜困难，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大家都把井场当成跟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较量的战场。每个人的岗位，就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争光的岗位。为了多打井，多出油，刀山也要上，火海也要下，只要为了党的事业，个人的生命算什么？

没多久，钻机运到车站。那时，“快摆硬上”，来了那么多井队，吊车、拖拉机不够用。怎么办？是等，还是上？我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是的，革命，就有困难，有困难就有斗争，这不是看戏，不是下馆子，打井就是革命，国家缺油，就要拿出油来，搞油就有困难，你不去斗争，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们马上开了支委会，组织大家学《愚公移山》，发动大家讨论怎么办？同志们说：干革命不能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人拉肩扛也要把钻机弄到井场。大家一个个象小老虎，硬是用绳子拉，撬杠撬，木块垫，

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把六十多吨的钻机拉到井场，安装好。

开钻打井得有水，当时，水管线没安好，水罐车又没有，怎么办？好多人说：没有水，咱们就是用脸盆端也得开钻。这时候，有个人说：“你们见过哪个国家是端水打井的？”我说：“就是我们国家！我们就是尿尿也要打井！”就这样，用大桶、小桶、脸盆硬是端了一百多吨水，才开了钻。

“困难是欺软怕硬，你的思想是硬的，  
它就要变成豆腐，你要软，它就硬”

开钻不久，又遇到漏层。大伙说：漏多少，端多少。把村子里水井的水端干了，我们就跑到一里多地的水泡子，砸冰取水，终于战胜了漏层，用六天多的时间，打成了第一口井。当我们看到哗哗喷出的石油，大家都高兴的跳起来。通过实践，我深深体会到：和自然作斗争就不能怕困难，困难是欺软怕硬，你的思想是硬的，它就要变成豆腐，你要软，它就硬。

打完第一口井要放井架搬家，没有拖拉机，我们全体职工硬是想办法，用人拉放井架。在指挥放井架时，一根钻杆滚下来把我的腿砸坏了，我昏过去了，醒来一看，工人抱着我的腿哭，井架还没放下来。我急了，就说：“打仗时伤了人，你哭，敌人来了把你们都活捉去，能哭吗？”我就坐起来继续指挥放，工人就把衬衣撕下来给我包住。井

架放下来，大家叫我住院，我不去。这天是“五一”，战区召开万人大会，我说：“这是第一次万人大会，不去怎么了解大会精神，又怎么能多打井，快打井，打好井。是腿要紧，还是出油要紧？”并和大家说好，谁也不准给领导讲，大家给找了个马车，把我送去了。

万人大会上，工委领导表扬了我们，给我披红戴花，让骑大马，叫我讲话，还号召全体职工向我学习。向我学啥啊，我们才打了一口井，还是工委领导亲自领着我们全体职工干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全体职工，我能干个啥，心里感到不安。万人大会上工委提出：尽快拿下大油田，“六一”把原油运出去，坚决要打个大胜仗。我听了这个号召后，忘了腿痛，当晚赶回队去，就和大家讨论怎么办？大伙说：下一口井是战区第一口生产井，要力争把我们打的第一口井的原油运出去，支援全国建设。干工作光有一股子干劲，猛冲猛打是不够的，三国有个张飞，他还粗中有细嘛！我们立即总结打第一口井的经验，给打第二口井提办法。

坏腿的事，以后领导还是知道了，对我非常关怀，硬是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里怎么能躺得住呀！万人大会上工委的号召，全国人民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我还在住医院，这怎么行？我就偷着溜回来，参加打第二口井。我拄着棍，在井上指挥，不久终于打成了战区第一口生产井，保证了“六一”原油外运，支援全国建设。

一九六一年二月成立大队，我当了大队长。不久，领导指示我们转移到南线去打井，这时矛盾出来了。有个

队的干部找我说：“我给你提个意见，你一来就在南线打井，还不知道南线压力高，容易井喷，倒霉的井都在南线，我们可不能去啊！”我说：“你说的，我们国家就是要打喷的井，把原油喷的哗哗的，多好啊！为什么怕它喷呢？”经过我们调查，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代表一部分人的思想。党总支召开会议，经过讨论分析认为，有的队对南线地层不太了解，没在南线打过井，怕井喷，怕井斜，是认识不清楚，一定要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决定开展大讨论：国家打井干什么？要打什么样的井？要不要打有压力的井？谁去打？经过大讨论，使职工提高了认识，鼓起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工人们说，“怕什么啊！我们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小米加步枪，打出了个新中国，南线高压层有什么可怕的呢！”这一年打成了九十多口井。

### “按毛主席的实践论去干”，“根据我们的条件，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一九六二年以前规定井斜不超过五度，一九六三年工委又提出高标准，不超过三度。工委领导同志问我：“拥护不拥护？”我说：“坚决拥护，依靠党、依靠全体职工，按毛主席的实践论去干。”回来我们就组织全体职工学《实践论》，有一个技术员一听说要打直井，就搬出那么厚的一本“洋”书看，我奇怪地问他：“你老搬那家伙干啥呢？”他说：“这上头有个自动防斜的工具。”我说：“那很好，这



王进喜同志在学习毛主席著作

东西现在我们能不能做？”他摇头说：“做不成，做不成！”我生气地说：“你这话等于没说嘛！我们不能搬洋框框，毛主席说要我们自力更生嘛！我们根据我们的条件，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你老搬那家伙有啥用呢？”根据毛主席实践再实践的教导，我们坚决走自己的道路。工委领导亲自组织我们钻井的全体职工讨论。同时组织一部分技术干部和老工人三结合，一边摸索着干，一边总结经验。我们边实践边找办法。最后，打成了只有两度多的直井，以后又打出只有半度的直井。

这次打直井对我教育得深。这是在工委的直接领导下，使全体职工知道了打直井的意义，掌握了地层和设备的规律，所以打得又好又快。我过去打了不少的井，有的井打得好，也打过斜井，为什么？主要是没注意政治挂帅，没抓人的思想，首先是我们的思想歪了，所以，才打出了斜井。要打直井，首先我们脑瓜子里要有个直井，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脑子里没有个直井，一辈子也打不出直井来。

一九六五年，工委又提出高标准，要打“三一”优质井（一天、一个钻头、打一千米）。有的井队想打又不敢打，有些人怕丢掉标杆队。我说：我打，我就不怕摸老虎屁股。干革命就不能怕担风险，还没干就吓回来了，那还行。这时，另外一个队也打“三一”优质井。两个队并排打，我一面打，一面把发现的问题告诉他们。结果，那个队打成功了，我把井打斜了八度。我在会上向大家检查说，井打斜了是我的责任，不算大家的事，你们的责任，就

是帮助找原因。最后总结出八条经验，连续打出六口“三一”优质井。

通过在大庆几年会战，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怎么讲，就怎么做，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克服困难，首先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不能光看到困难，也要看到成绩，看到有利条件。克服困难，光嘴上说不行，要研究困难，想办法解决困难，去做工作才行。克服一个困难，就是一个胜利，就是一次提高，就学会一个克服困难的办法，就增加一分革命信心。

### “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 还要与人的错误思想斗”

干革命不仅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还要与人的错误思想斗。一个人想什么，也得有个规格，有些事情是不能想的，有些事情是可以开阔地去想。要想，就要想怎样拿下大油田，想这么多困难怎么克服，想我们给全国每个人多少石油，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有一个青年工人，是我喜爱的徒弟，有一段经不起考验，闹情绪要回玉门。我就把他找来严厉对他说：“你还记得你刚到玉门是个什么样子吗？穿条裤子露着腿，穿件衣服露着肚子，一双鞋补了又补有几斤重，你忘了吗？我可没忘，我也穿过几斤重的鞋。现在你身上穿着毛衣，床上铺着缎子被，这些都是怎么来的？都是党给的，

毛主席给的。”说得他直哭，他承认错误说：“我错了，你说咋办哩！”我说：“好好干，我们苦，顶多是多出两身汗，少睡一点觉，你看我们的革命前辈，那么大年纪还跑到草原上来吃苦，为什么？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向老前辈学习。”

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不能站在房子里热爱，不能光举拳头热爱，不能在口头上热爱，要干事。我们是打井的，把井打出来，把油拿出来，才是真正的热爱，不干就等于瞎说。热爱要永远热爱下去，就必须永远老老实实干下去。

有一次打完进尺，射孔层位老定不下来，耽误十几个小时。射不了孔，就搬不了家。那时井多人少，新地层，一时也难定下来。可是我着急地跑到地质指挥所，问他们是怎么搞的？有个同志说：“你干什么的？”我说：“我干什么的？我就是找你们麻烦的！你们确定不下来，射不了孔，搬不了家，耽误多大事呀！”有人劝我说：“不要着急，顶多耽误一会儿打井。”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味，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少打一口井，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斗争就少一分力量。我就跳起来说：“为什么让我耽误一会儿打井，为什么不让我多打两口井？你有什么理由？”越说越生气，我往桌子上一坐说：“晚上我不回去，你们什么时候确定，我爬起来就走。”

“任何艰巨任务不可怕,任何艰苦环境  
也不可怕,忽视政治领导最可怕。  
政治是灵魂,绝对忽视不得”

一二〇五是我原来所在的那个队,从玉门到大庆,是连续七年的标杆队。一九六三年全国经济形势好转,井队干部错误地认为阶级斗争形势也好转了,应该“抓抓进尺啦!”说:“标杆,标杆,要蒸出白馒头给人看看,进尺上不去,不象个标杆样子。”背上骄傲包袱,就放松了政治,忽视了阶级斗争和思想工作。结果有的工人听说猪肉值钱,就想回家养猪,说养猪比干钻工强;有的工人离开岗位去看电影。队上有名的“小老虎”变成了“小老鼠”,事故接连发生,着了一把火,打废了一口井,造成很大损失,上半年就丢了“标杆”。这时干部才清醒过来,坐下来搞了一个半月的整训,总结教训。干部检查说:“那时,干部一心只想‘扛红旗’多打井,只管自己扛着小红旗朝前跑,出现了那么多问题还不知道,真危险啊!”

工人的问题是干部的问题,下面的问题是领导的问题,一切问题是思想问题。一二〇五队的问题,是我大队长的问题,是我忽视了政治,在思想上放松了领导,认为象一二〇五队这些先进队,在六〇年、六一年和六二年那么困难的时候,都是抢山头的队伍,拖不垮,打不烂,现在好转了,还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抓得就没有以前那么紧,去的就少了一点。这样一忽视,走了个大弯路。我到

队上去检讨了三天。在工委的关怀下，在钻井党委的领导下，井队职工通过这次整训，进一步提高认识，狠抓政治挂帅，进一步树立不为钱、不为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人生观。“小老鼠”又变成“小老虎”。上半年找到教训，下半年政治挂了帅，结果是打一口井，成一口井，口口井合格，一直地上来了，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又评为标杆队。通过这次教训，我进一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在职工中反映再强烈不可怕，任何艰巨任务不可怕，任何艰苦环境也不可怕，忽视政治领导最可怕。政治是灵魂，绝对忽视不得。

### “阶级斗争一点也不能放过，要斗争一辈子，斗到底”

阶级斗争一点也不能放过，要斗争一辈子，斗到底，斗争到停止呼吸的时候算。也有的人劝过我说：“你不要见事就管，见事就说，刚强是非多呀！马马虎虎，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算了！”我问他：“你从哪里学来的谬论啊？为什么刚强就是非多？”他说：“刚强到处惹人不爱。你见事就说，怎么了得？”我说：“党叫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为什么不说？按党的指示，应该说的我都要说，应该干的我都要干！我要斗争一辈子，斗到底。为了党，为了革命，我有什么可怕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工作就是斗争。”“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在大庆通过六年会战，我深

深地体会到：一个革命者的一生，就是战斗的一生，就是克服困难的一生，要艰苦奋斗一辈子，要斗争一辈子。斗争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人的错误思想斗。要永远斗下去，我们斗不完，叫下一代再斗，直到斗出个共产主义来。

### “全是党的教导和毛主席思想的指引”

我所以能为党、为人民做些工作，这全是党的教导和毛主席思想的指引。在旧社会我六岁拉着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讨饭。一九三八年玉门油矿一成立，我就被拉去当民夫，干了十来年，受苦卖命，没捞到一套铺盖，铺的是一摊麦草，盖的是一张烂羊皮，没上过钻台，没摸过刹把。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反封建把头，诉了苦，提高了阶级觉悟。是党救了我，翻了身，当了国家主人，还培养我当了副司钻。那时我只想要好好学技术，为党好好工作，报答党的恩情。

以后，我入了党，在党的不断教育下，阶级觉悟又有不断提高。知道了世界上现在还有好多象我母亲那样，在旧社会被保甲长打了又打的人；还有好多象我父亲那样，受地主打骂反被判了几年徒刑的人；还有好多象我那样讨饭、失业、受剥削、受压迫的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打井，是为了祖国富强，也是为了支援世界上那些求解放闹革命的人。认识到以前那种单纯报恩思想是低水平的。懂得打井就是革命，

打井就是和反动派打仗，打井就是为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得解放。

在党的培养下我由一个普通工人，当了干部，从井队长、大队长、到现在的副指挥。一个共产党员不能说水平低不干啊！这是党的信任。我总想我是个钻工，当了干部还是钻工，要永远参加劳动。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当“孺子牛”。我从小放过牛，最摸牛的脾气，牛吃草，马吃料，



王进喜同志在向青年工人进行阶级教育



期，他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还在继续艰苦奋斗。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只是多干活，少睡觉，这是低标准的艰苦奋斗。应当能为革命担更重的担子，能在最复杂的环境里做艰苦工作，能在最困难的时候顶上去，能在最危险的情况下不怕牺牲，能做别人不愿干、不敢干的革命工作。艰苦奋斗是党的性质确定了的，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要艰苦奋斗一辈子。更主要的是教育青年要艰苦奋斗，把党的光荣传统世代传下去。

“成绩要记在党的帐上，记在毛主席的帐上，记在全国人民的帐上，我只能有个小本子记差距”

一九六四年党中央表扬我们，我就和同志们大学两分法。毛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就想，搞好工作是党指的路，叫我们走的；没走好，出了问题，领导把责任承担去，干出点成绩就大力表扬，这成绩要记在党的帐上，记在毛主席的帐上，记在全国人民的帐上，我只能有个小本子记差距。所以，我就和同志们到三矿四队去学习严细作风，回来针对我们的井场大找差距，找出“脏”“松”“漏”，不安全和不整齐的大量差距，紧接着就找原因，主要是老毛病旧习惯造成的。我们就向老毛病斗争。

有一次，我到井场检查工作，一眼看到一个工人擦机器用手抓油，然后将满手的油又擦在衣服上。我觉得这

是个坏作风，应该反掉，就批评这个工人。这个工人说：“我第一天到井场，看见师傅就是这样做的。”我就把他师傅找来，批评他没有带好徒弟。这个师傅说：“当初我学徒的时候，看见你也是这样做的。”追来追去追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就向工人作了检查，我说：“我是十多年前的老毛病，现在已经改掉了，你们千万别跟我学这种坏作风。”以后，我就随时随地注意克服自己的老习惯、老毛病。这样事还多着呢！我只是举个小例子。要想有个好作风，首先是言教身带，先严格要求自己，再要求别人。

表扬和批评都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力量，不能受了表扬，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沾沾自喜，翘起尾巴；也不能受了批评就垂头丧气，甚至有意见。

我以前工作不讲方法，批评人有些硬，有的同志对我有意见，我还想不通。学了毛主席著作思想提高了。毛主席说：“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自己一个脑瓜子看不到缺点，大家那么多脑瓜子看得清楚，脸上有黑，别人给你擦掉有什么不好啊。领导和同志们批评得对也好，不对也好，我应该首先检查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究竟干好了没有？干对了没有？干得不好，不对，就要接受意见，坚决改正。

一九六一年我们射孔射错了。领导在一次会上批评我们。我晚去了一会，刚到门口，有个工人就对我说：“赶紧趴下趴下！”我说：“趴下干什么！”他说：“领导正在批评我们呢！”我说：“你这个同志说的，披红戴花的时候，你让我抢着往头里走，批评了，就叫我悄悄地趴下当狗熊？我

不能当这个狗熊！”我就是要到前面去，更好地听听领导的批评。

**“紧紧跟党走，跟着毛主席走，  
要跟紧、跟准、跟好”**

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思想是力量的源泉，是一切胜利的根本。毛主席的思想多一分，人的志气就增加一分，生产就前进一步。只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自己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矛盾都可以解决，工作就可以搞好。

我生平最难忘的，就是见过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九年我见过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又看见了毛主席，兴奋得我直流热泪。我这个在旧社会放牛的穷汉，是党和毛主席使我站了起来，当了国家主人；是党和毛主席教育我成长壮大，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智慧；是党和毛主席给我指引了大道，使我有了方向不断前进。我为党只是做了一点应做的事，党却给我很高很高的评价。这荣誉应归于党、归于毛主席。我做的还很不够，表扬是给我提出了最高的要求，今后要更好地为党工作。

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党和全国人民向我们石油工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坚持政治挂帅，更加加紧学习毛主席著作，加深队伍的革命化。要全面地贯彻总路线，继续艰苦奋斗，继续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把油田

建设得更好。革命需要多少油，我们就拿出多少油。要紧紧跟党走，跟着毛主席走，要跟紧、跟准、跟好，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载 1977 年 3 月 28 日《人民日报》）

# 石油工人经历的两重天

——大庆油田会战老标兵薛国邦的家史

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和煦的东风，把一阵阵的石油芳香，送进了大庆油田的来宾接待室。十几位回国观光的华侨青年，正在全神贯注地倾听大庆油田党委常委、总工会主任薛国邦同志介绍大庆油田的战斗历程。薛国邦同志激动人心的言词，博得了华侨青年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这是一曲多么壮丽的毛泽东思想的凯歌啊！华侨青年为大庆油田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欢呼；为祖国同胞的英雄气概而自豪。虽然薛国邦同志已向他们作了长篇详尽的介绍，而他们还觉得讲得太短了。一个个望着这位英姿飒爽的老英雄说：“请再讲讲吧！讲讲你自己是怎样成为老标兵的。”

薛国邦饱经风霜的容颜，露出了谦虚的微笑。他说：“我自己有什么可讲的呢？正象千千万万的石油工人一样，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了我，新旧社会的亲身经历激励着我，使我得到了无穷的战斗力量……。”

是的，这位老工人不算太短的生活经历，鲜明地反映

出石油工人在新旧社会所经历的两重天下。

### 戈壁滩上的“活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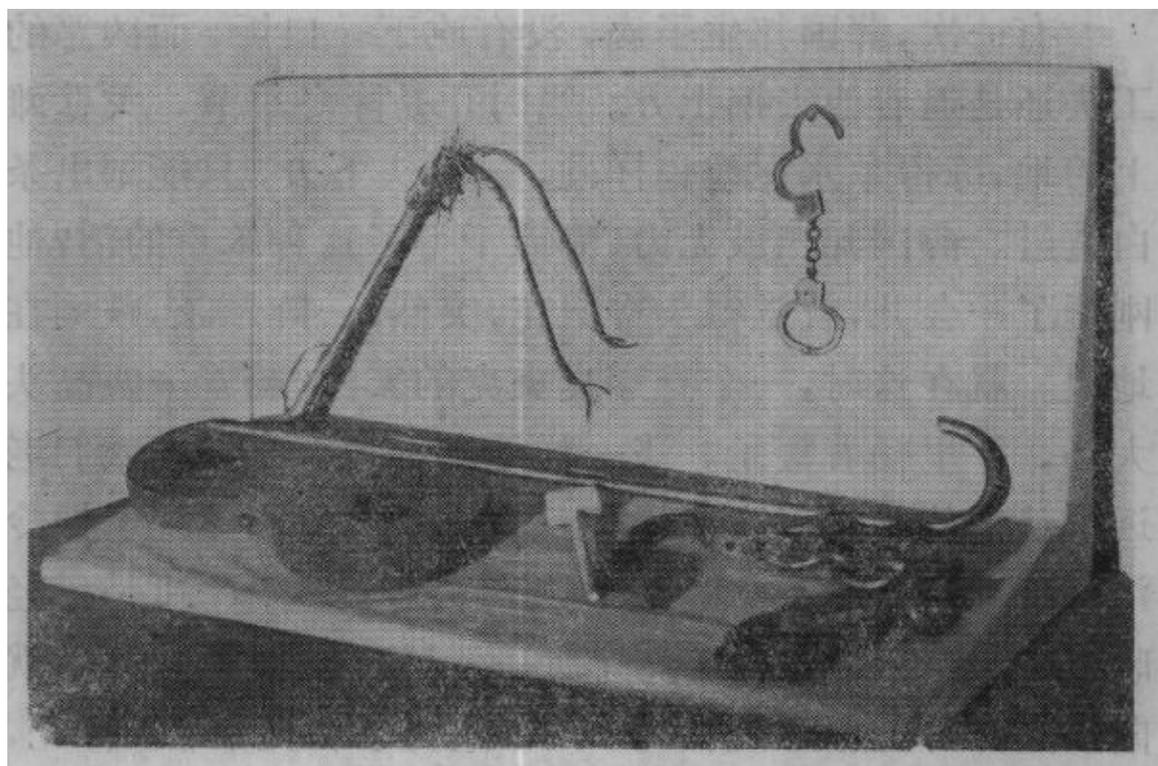
薛国邦的老家在甘肃省酒泉县。他童年时期，一家十口只有两亩瘠地。不要说那时候十年九荒，就是上好年成，两亩地又顶什么用呢？因此，他十二岁的时候，就被迫到地主家里当放牛娃。所谓“放牛娃”，实际上是个什么都得干的小杂务工。一天到晚，干不完的活，挨不完的打。他受不了这种折磨，逃出了虎口，拎着篮子要饭。在那反动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农民们头顶的天是地主的，脚踩的地是地主的地，要饭也是寸步难行啊！而不久连这种要饭的苦日子也不让他过下去，一场灾难临到了他的身上。

那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四大家族”妄图进一步掠夺我国的地下资源。官僚资本经营的玉门油矿，为了扩大业务，需要大批的廉价劳动力。可是，玉门油矿是有名的“活地狱”，有谁愿意到这里卖命送死呢？听吧：“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进了玉门矿，如进鬼门关。”这首歌谣，就是当时玉门矿工悲惨命运的写照。因此，尽管他们贴出了骗人的招工广告，自动报名的人还是寥寥无几。于是，这个有权有势的官僚资本企业，就勾结了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动用反动军警，采取了所谓“征派”的方式招工。实际上就是象抓壮丁一样的到处抓工。



一天晚上，薛国邦的一家默坐在屋里，正在为“抓工”的事情提心吊胆。忽然，门外传来了几声狗吠，接着就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片刻之间，伪保长带领着几个扛枪的狗腿子冲了进来。伪保长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对国邦的爹说：“这么大的小子，呆在家里干什么？到矿上去干活多有出息呀！”说着就向狗腿子们递眼色。两个狗腿子就揪住国邦往外拖。国邦的爹娘急得连忙上前想把国邦护住，却被狗腿子们用枪托打倒在地。这样，国邦就被他们强行抓走了。

薛国邦被押送到县里，过了一天，就和一百多个被抓来的苦难兄弟一起，由反动军警押送，穿过黄沙蔽天的戈壁滩，到达了玉门油矿。还没有走近油矿的大门，就远远看见，大门口四根砖柱冲天而立，大门两边围着比人还高



解放前玉门油矿工头矿警迫害工人使用的部分刑具

的铁丝网，警戒极其森严。可以想象：进了这座“活地狱”，真是插翅难逃啊！

薛国邦进了油矿，被分配当建筑工。干活时有工头监督；上下工有工头押送；夜里睡觉有矿警看守，而且还把鞋子、裤子都收了去；就连吃饭、上厕所也有人看着。在这里当工头矿警的，都是些心比墨汁还要黑的坏家伙。工人们说：“蝎子尾巴蜜蜂针，也毒不过工头的心。”他们不但打人骂人，还设立了刑房，常常对工人施行惨无人道的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往指甲里插竹签等，共有二十多种。

### “候死室”里留余生

有一次，薛国邦生了病，没有吃下一口饭，而凶恶的工头还是逼着他去挖土方。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戈壁滩上的地，冻得象水泥地一样硬，一镢头下去，只能划出条白道道。薛国邦四肢无力，哪能干得了这种笨重的活？他刚干了一会儿，就觉得头昏眼花，突然，一阵晕眩，跌倒在地上。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皮夹克的家伙，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手里扬着鞭子，飞一样地向工地奔来。工人们老远就认出他是大工头王建英。大家都替薛国邦捏了把冷汗，他们赶快叫醒了，薛国邦尽力挣扎起来，可是已经晚了，王建英跳下马，就直冲到薛国邦跟前，扬起鞭子就向薛国邦身上狠命地抽打，一口气打了有几十下，打完，又骑上马扬长而去。薛国邦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鲜血直淌。

接着就由矿警把薛国邦送进了“病号室”。这哪里是什么“病号室”啊！简直是一座等待死亡的“候死室”。他们把一些患了重病、或被打得半死不活的工人，都送到这里，不等这些工人死亡就送到野外去喂狼。薛国邦躺在一堆烂草上，喘着粗气，周身的伤口疼痛难忍，动也不敢动，耳边响着难友们悲惨的呻吟声、哭泣声。他一连几天几夜，饭不能吃，觉不能睡，伤势病情都一天重似一天。毕竟阶级兄弟心连心，受苦人疼受苦人，和薛国邦经常在一起的工友，一个个跑来看他，替他弄药、送饭。他们恐怕薛国邦的病好不了啦，就想方设法给国邦的爹捎信。他们说：“无论如何，要让国邦最后再见亲人一面啊！”

薛国邦的爹接到工友们捎来的信，一家人都急得心如火烧。他爹当天筹划了点吃的东西，带在身上，第二天就上路了。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走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才摸到了玉门油矿的大门。那时的玉门油矿，“做工如坐牢，探亲如探监”。探望亲人，要有“黑狗”（穿着黑衣黑裤的反动矿警）发给的“特许证”，才能隔着铁丝网和亲人见上一面。而在那金钱万能的黑暗社会，不用金钱贿赂，怎能领到这种“特许证”？因此，油矿的门外，每天都拥挤着一群千里迢迢前来看望亲人的老人和妇女，被那些如狼似虎的“黑狗”们吆喝着、驱赶着。薛国邦的爹，自然毫无例外，也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不论他是苦苦哀求，还是大吵大闹，都毫无作用，“黑狗”们说什么也不让进去。后来还是国邦的工友们知道国邦的爹已经来了，凑

了些钱，塞给了“黑狗”，总算让薛国邦能够见到他爹。父子相见，放声大哭。半晌，国邦忍着哭泣说：“爹，我死要死在家里，我跟你回去吧！”这时，那些“黑狗”们忽听国邦说要回家，就冲过来连拉带打地把国邦的爹赶走了。薛国邦听着爹爹渐渐离远的哭喊声，气得昏了过去。

过了一些日子，薛国邦由于工友们热情照顾，并设法给他弄来了草药土方，病情逐渐好转，终于得到了痊愈。

薛国邦病好以后，就和工友们商量说：“我这次虽能从死里逃生，但继续在这里干下去，还是逃不掉死亡的命运，不如逃走吧！”工友们也都说：“大家一起逃吧，不逃早晚都死在这里。”可是，油矿警戒森严，要想逃出这个虎口，谈何容易？有一次，他们只是溜到铁丝网附近察看了一下，就被“黑狗”们狠狠地抽了几鞭子。

有一年夏天，一连下了几天大雨，从祁连山上倾泻下来的雨水，把矿场上土池子里的原油冲得到处都是。一天晚上，一个工头请上司喝酒，在伙房炒菜时，灶洞里的火花迸发出来，引着了被水冲出来的原油，加上大风一吹，顿时满山沟成了一片火海。工人们一看逃跑的时机来了，齐声喊道：“跑啊！跑啊！”一下子跑掉了五六百个小工。薛国邦以及和他要好的六个工友，也夹杂在逃跑的人群中，一口气跑了三十多公里。脚磨烂了，肚子饿得直响，实在是一步也挪不动了。七个人就靠拢在一起坐下休息。可是，这时矿上的国民党宪兵队和矿警队一齐出动，已经堵住了所有的路口，结果有一百多个小工包括薛国邦在内，被他们捉住，绑在车上，押回油矿，送进了

牢房。

## 找到了苦难的根源

薛国邦在牢房里受尽了毒刑拷打，总算活着被放了出来。在一些穷哥们的帮助下，改到井场上做搬运工。那时候搬运物资，没有吊车，再笨重的东西，也全靠人力手拉肩扛。那些打井用的钢管、机器等等，大都是几百斤重的庞然大物，整天压得薛国邦抬不起头来。可是，更使他抬不起头来的却是美国佬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在井场上经常能看到美国佬，他们总是那么神气活现，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这种民族的屈辱比肩头的重担更为难忍啊！

有一次，美国“专家”白勒克的小狗崽子，拿着枪，在街上打死了一个中国孩子，而国民党的反动警察局，蓄意包庇，说是“误伤”，竟不加处理。这个中国孩子的生命就白白断送了。

又一次，井队工人上班不久，一个姓秦的钻工在二层平台上扣吊卡，那天的风特别大，秦师傅立在平台上站也站不稳。这时，扶刹把的美国司钻菲尔，不顾中国人的死活，照样轰大油门开车，吊卡飞速上升，秦师傅的衣服被吊车勾住了。秦师傅大声呼救，菲尔仍不停车，于是秦师傅从二层平台摔下来。菲尔不但见死不救，还一脚把秦师傅踢到钻台下，秦师傅当场身死。

这一笔笔血债，一桩桩仇恨，薛国邦看在眼里，就觉得心里有一团熊熊的烈火在燃烧！一天傍晚，薛国邦一

个人坐在附近的小山头上，凝视着茫茫无垠的戈壁滩，心潮在起伏翻腾，一连串的问号在他脑海中闪现：穷人为啥到处受欺压？美国佬为啥能在咱们祖国的油矿上横行霸道？劳动人民的苦日子有没有尽头？……对于这些问题，薛国邦想来想去总是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其实，这些问题，不仅是薛国邦经常思考的问题，也是广大石油工人经常思考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就成了工人们聚在一起时的议论中心。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相互启发，时间长了，思想就渐渐地开朗了。在这些工人兄弟中，薛国邦也交上了一些朋友。有个从陕北延长油田来的老钻工，薛国邦感到他说话最有道理，句句说到自己的心里。就这样，薛国邦终于弄清了这些问题。他说：现在我明白了。黑狗子、工头为什么能欺侮咱，不是因为他们有权、有势、有枪吗？他们的枪不是国民党政府发给的吗？说来说去，我们受苦受难，就是因为有个反动政府为这些家伙撑腰，甘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咱们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推翻这个反动政府，受苦受难的穷人才能出头。

## 罢工斗争的革命风暴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有剥削，那里就有斗争。纸是包不住火的，反抗斗争的烈火在燃烧，革命就一定会爆发出来。特别是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玉门油矿党的力量增强了，广大矿工的觉悟也日益高涨了。他们采取了各种形式，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斗争。尽管矿

上的反动派实行了更加严酷的反动统治，还采取所谓“十人连环保”（即一人逃跑，其余九人都要坐牢）的法西斯措施，但逃跑的人还是不断增多，并且多次发生了集体反对工头和美国佬凌辱工人的事件。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罢工斗争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着。

一九四四年秋天的一天晚上，一些油矿工人的代表们偷偷地集聚一起，商量进行罢工斗争的问题。代表们一个个横眉怒目，义愤填膺。主持会议的代表说：“物价一天天狂涨，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都乘机大发国难财，穷苦人的骨头都被他们榨干了。为了活命，我们要求增加工资。不增加工资就实行罢工！”大家听了都喊着说：“对！罢工！罢工！”接着就研究了有关罢工的一些具体问题。

第二天一早，工人们带着“武器”，揣着吃的干粮，把矿场办公室围了个水泄不通。薛国邦也挤在这个革命的行列里，他怀着平生从未有过的兴奋心情，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拿着一根铁管，铁管头上还安上了一只锐利的铁尖子，等候着指挥员的命令。他巴不得马上就挥舞起铁管，和那些吃人的魔鬼拚个你死我活。这时，工人们高呼着要矿长出来，紧接着又要向里冲，矿长怕工人冲进去，才走出来死样怪气地胡说了一通，讲了些要“共赴国难”等等的骗人鬼话。工人们听了气得狂喊：“不听你这一套！”于是他又改变态度，油腔滑调地说：“同意增发工资”，还说“下午就发”。可是，就在这时，他们已调集了反动军警，把罢工的工人们包围起来，所有的走道口都架



解放前玉门油矿工人举行罢工时用的武器

上了机关枪，并且宣布紧急戒严，眼看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就要发生。但工人阶级是硬骨头，已经觉醒了的工人是吓不倒的，罢工的指挥人员立即下令罢工开始。于是，工人们封闭了全部油井，停掉了全部锅炉，整个油矿瘫痪了，被包围的工人也和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矿长考虑到事情进一步闹大对他们更为不利，被迫答应了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玉门油矿工人的罢工斗争获得了胜利。这次罢工使薛国邦受到了教育，鼓舞了斗志，增强了信心。他清楚地看到那些反动家伙既残忍、又虚弱的真面目。

一九四九年夏天，解放的红旗即将插遍全国，国民党反动派还在作垂死挣扎，准备进行疯狂破坏。他们甚至

调集工兵、炮兵，妄图把玉门油矿炸掉。为了粉碎敌人的反革命计划，油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护矿自卫队，薛国邦参加了自卫队，面对着敌人的枪口，和井场的工人们一起，展开了护矿斗争。他们封闭油井，埋藏机器，保护了人民财产，并使它们安全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 在五星红旗下飞速成长

油矿工人终于熬过了苦难的黑夜，盼到了黎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玉门油矿。从此，玉门油矿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的手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石油工人翻身做了主人。那些过去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血债累累的工头和反革命分子，一个个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面对着这种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薛国邦感到自己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浑身上下都充溢着干劲。和千千万万的工人一样，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好国家的主人，搞好油矿的革命和生产。

解放以来，他一直是竭尽全力忘我的战斗着。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他总是冲在斗争的最前列。在生产岗位上，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与安危，曾经好几次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发生了事故苗子的油井。有一次，供油管线脱扣，他奋不顾身地用胸膛顶住喷着原油的管口，高压原油的强大压力打得他周身麻木，几乎失去知觉，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促使他继续顶住管口，坚持不放，终于保住了油井。就这样，由于党的教育培

养和他个人的努力，他在政治上生产上都在迅速成长和提高。

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这是薛国邦永远难忘的一天。他面对着毛主席的宝像和鲜红的党旗，向党和毛主席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薛国邦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此以后，他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得更快了。一九五六年，这个普通的钻井工人，勇敢地挑起了一个井队队长的重担。就在这一年，由于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评选为全国石油系统的先进生产者。

薛国邦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他入了党、当了干部、评选为先进生产者以后，就以更高的标准从严要求自己，在政治上、生产上，仍然事事带头，保持劳动者的本色，主动团结同志，受到工人群众的普遍赞扬。因此，一九五八年他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在大跃进的战鼓声中，薛国邦学习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敢想敢闯，从此，他不仅是一个英勇无畏的石油战士，而且成了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能手。这一年他和群众一起提出的革新建议达五百多项，其中如油管爆炸，不起泵压裂等四项技术革新，解决了当时生产技术中的关键问题，促进了生产发展，并为国家节约了十多万元。

一九五九年，薛国邦领导的综合采油三队，被评为石油工业部一九五九年的采油标杆队。薛国邦本人被评选

为出席甘肃省和全国工业建设“群英会”的代表。

就在这一年，一个日盼夜想的幸福时刻来到了。那是在新中国建国十年大庆的日子里，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薛国邦幸福的见到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薛国邦望着毛主席神采奕奕地登上了主席台，他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啊！我终于亲眼看见了我们国家民族的救星、我们苦难人民的救命恩人。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从他的眼眶里流出来，流到了腮边，流到了脖颈。他心里有多少话想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讲啊！可是怎么能够呢！这么多的人，怎么能够一个个地跑上去向毛主席倾诉那几天几夜也讲不完的心里话？他跟着大家一起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手掌拍肿了，嗓子喊哑了。薛国邦沉浸在难以形容的欢乐幸福之中。

## 敢教日月换新天

进入六十年代的初期，我国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国家经济遇到了暂时的困难。苏修、美帝以及国内外的反动派，趁机勾结一起，掀起了反华恶浪，他们妄想用石油卡住我们的脖子。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党中央，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同时也考虑到百年大计，决心甩掉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加速石油开发工作，批准了在祖国北疆组织一场石油大会战的决定。于是有关部门就从四面八方调集千军万马奔赴大庆。

薛国邦一听到这个消息，连夜就写了请战书，要求马

上奔赴大庆。起初，领导上考虑到他身体不好，没有同意。薛国邦急得几夜都睡不着觉，一连递了三次申请书，还多次找党委书记谈自己的决心，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早就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党，现在为了甩掉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反击敌人的进攻，我怎么能够考虑个人的身体呢？”领导上看他决心大，也考虑到那里确实需要他这种既有干劲，又有经验的老石油战士，就批准了他的要求。

薛国邦来到了“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的大庆，担任了第一个采油队的队长。在那艰苦创业的日子里，薛国邦经常整夜不脱衣服睡觉。白天他领着队上的工人上井生产，晚上就和大家一起学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别人都熟睡了，他还要在半夜里起来查铺，给同志们拾柴添火，以免在这寒冷的大草原上冻坏了身体，影响明天的生产。天蒙蒙亮，他就提前起来帮助炊事员提水做饭。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啊！薛国邦和广大石油工人们，发扬了革命加拚命的顽强战斗精神，天大的困难脚下踩，千斤的重担敢上肩。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于是，很快就在这茫茫的北疆草原，打出了滚滚的石油。不仅为我们国家发掘了新的石油资源，而且为石油工业的历史写下了新的篇章。中国人民的壮志豪举震惊了世界。让那些坚信中国东北不能开出石油的外国专家死守他们的洋教条吧！让那些趾高气扬的所谓“天之骄子”在他们自己房间里威风去吧！让那妄图用石油卡我们脖子的政治阴谋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吧！

会战党委以及参加会战的全体人员，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渴望尽快地把第一列车原油运到北京。党委把这个向列车输送原油的光荣任务，交给了薛国邦所领导的采油队。薛国邦接受了这个任务，就不论白天黑夜都紧守在井旁。饿了就啃口馒头，困了就在井旁打个盹，一刻不离。一天晚上，气温突然下降，油池子里的原油由于温度降低凝结成了固体，输油泵怎么也不能把原油打进罐车里面去。这时，离列车预定的开车时间已经很近了，还有几节罐车没有装满，怎么办？这意外的情况使工人们个个心似火燎。国家需要油！革命需要油！全国人民的亿万双眼睛都在望着大庆！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同志，也正在北京等待着这列散发着石油芳香的列车啊！想到这里，薛国邦毅然脱掉棉衣，纵身跳入油池，双手抱起沉重的蒸气皮管，向冻硬了的原油刺去。这时，在井旁的其他同志们也都紧接着跳进了油池。高温的蒸气管线把薛国邦的手烫坏了，再加上他的关节炎病这几天正在复发，钻心的疼痛使他一时变得脸色发白，站立不稳，但他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着战斗，最后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第一列车大庆原油准时运到了北京。

不久，会战指挥部召开了万人庆功大会，薛国邦披红戴花，指挥部的领导同志亲自给他牵着马，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同铁人王进喜等模范一起被树为油田的五面红旗之一。

时间在胜利中前进。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今日的大庆油田，已经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石油基地。薛国邦



薛国邦在井队和工人们研究生产中的问题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也已成长为这个基地的重要骨干力量。他被选为大庆油田党委常委、总工会主任。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他作为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会的代表到北京开会。在人民大会堂，他见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亲自主持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开幕式前，于今年四月十九日亲切接见了大庆党委和油田各指挥部党委的负责同志以及油田英雄模范和先进单位的代表等，薛国邦同志作为老英雄受到亲切接见。这时，他回想起大庆油田的战斗历程，想到“四人帮”一伙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的罪恶阴谋，禁不住地流出了激动的眼泪。他说：有了英明领袖华主席，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就能永远飘扬在祖国的上空。

通过薛国邦的成长过程，使我们看到：昔日的奴隶，砸烂了旧世界的锁链，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就能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正是这些千千万万的“奴隶”，使我们古老的祖国日新月异地改颜换貌。

# 三代石油工人的悲欢

——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老工人王天贵讲家史

列车在辽阔的原野上向前奔驰。我靠在车椅背上，透过擦得净亮的玻璃车窗，凝视着沸腾的千里油田，一股欣慰的暖流在我的胸中澎湃。那高耸入云的井架、巍然屹立的炼塔、星罗棋布的井房、密如蛛网的输油管线……这一切都是我们亲手创造、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啊！

一颗红心一双手，  
我为祖国献石油。  
激流任我跨，  
大地任我走。

.....

车厢里响起了年轻人的欢乐的歌声，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望着这些放声高唱的青年工人，不知怎的，一个个熟悉的面庞，忽然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浮现：我那当了多年石油矿工的老父亲；那许许多多庇护过我的老一辈的石油工人，特别是吴师傅、齐师傅，他们大都在苦难中悲惨的死去了。我以及同我年岁差不多的伙伴们，我们经

受过苦难，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们在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享受到了今天的幸福。至于坐在我面前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在红旗下诞生，在幸福中成长，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受过旧社会的罪，对他们来说，要懂得今天的幸福是怎样得来的，应该怎样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幸福，似乎还需要补上这一苦难的阶级教育课啊！

“王师傅，你在想什么啊？”

“我在回忆过去，回忆我们石油工人的苦难历史……”

## 父子被迫逃进“活地狱”

我父亲是玉门油矿的老矿工。在解放以前，人们都知道：玉门油矿是戈壁滩上的“活地狱”。一个人活着走进去，就很难再活着走出来。我父亲为什么要到这种可怕的地方做工呢？没有办法啊！一场严酷的灾难，逼得他不得不向着这个地狱里逃啊！

我的老家是在甘肃省酒泉县。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一家都给大地主马火图干活。父亲在他家当长工，母亲为他家打草，我和哥哥替他家放牛放羊。

马火图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乡亲们称他“笑面虎”。一九四〇年的春天，“笑面虎”勾结了国民党匪军把哥哥抓去充当了壮丁。事隔不久，“笑面虎”家的草垛失了火，他又毫无根据地诬赖我父亲放的，把父亲吊在树上狠命地毒打，逼着我们赔他钱。在那个社会里，哪有我们

穷人讲的理啊？父亲怕被他们打死，只得从这个恶魔的手心里逃出来。逃到哪里去？真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明知是火坑，也得往里跳。这样，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父亲带着一身伤痛，偷偷地逃奔玉门油矿。“笑面虎”心狠手辣，见我父亲逃走了，就把我姐姐抢到他家里，说是顶“放火债”。尽管如此，他还不肯罢休，又千方百计地继续陷害我们一家。有一天，下着倾盆大雨，我把牛赶回他家，刚刚进门，“笑面虎”就诬赖我丢了一头牛，我正想辩解，话还没有说出来，就被他一脚踢倒在地，接着又拳打脚踢，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还限我两天以内将牛找回来。他这样无事生非地折磨我，我怎么能受得了？家乡再也呆不下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得跟随着父亲的脚踪，也逃往玉门油矿。这时，我父亲离家已经两年多了，我还只有十二岁。

我一个人从家乡逃出来，穿着褴褛不堪的单布衫，光着脚板，忍着饥饿，在戈壁滩上走了两、三天，好不容易地走到了玉门油矿。老远就看见油矿外边围着层层铁丝网，每隔一段就有一个碉堡，那些背着长枪的矿警，在碉堡周围来回地晃荡着。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浑身筋疲力尽，一下子就瘫坐在矿门对面的上坡上。刚刚坐下不久，忽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回头去看，猛地就挨了两记耳光。一个持枪的凶恶的矿警吆喝着：“滚！滚！”接着他又端起枪托向我打来，我看苗头不对，只得拔脚就跑。

我正在离矿门较远的地方徘徊，看见一个人赶着辆

马车走来，我赶快向这位赶马车的叔叔打听我父亲的情况。这位叔叔不认得我父亲，但对我的遭遇却很同情，他叫我藏进马车上的草垛里，把我带进了油矿。

进了油矿，经向好多人打听，才知道我父亲是在矿工住的窝棚那边做烧饭师傅。我摸到了那个地方，老远看见一个人挑着一担水，正摇摇晃晃地走着。突然一个工头模样的家伙，从屋里窜出来，骂道：“妈的，挑担水要这么长的时间！”一边骂，一边就举起青铜棍朝那个人身上乱打，那个人被打得栽倒在地上，一担水也全泼光了。等工头走远了，我怀着既愤怒又同情的心情奔过去，赶快把那个挑水的人扶起来。我还没有看清这个人的面庞，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颤抖地说：“贵子！你怎么来啦啊！”我被这意外的声音惊呆了。随着这声音我才看清，原来这个人正是我的父亲。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父子竟是在这种情况下会面啊！我父亲穿着一件肮脏不堪的老羊皮袄，蓬乱着头发，面孔枯瘦如柴，我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我忍不住满腔悲愤，扑在父亲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 新灾难的开端

不久，我这个偷偷混进矿来的孩子，经过那些穷苦的伯伯叔叔的热情帮助，总算能在矿上安顿下来，在油库当了一名试用工，干些杂务活。可是，在那个社会里，进矿当了矿工，决不是幸福的起点，只能是新的灾难的开端。我虽然逃过了地主的鞭子，却又被践踏在帝国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的铁蹄之下。矿工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啊！每天从鸡叫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听到狼嗥，长达十几个小时。住的是破窑洞，吃的是酸溜溜的发霉的小米饭，拚死拚活地干一个月，扣掉伙食费，剩下的钱只够买两根麻花。甚至连这点血汗钱，工头也不让你拿到手，经常还被他们巧立名目敲诈了去。

那时玉门油矿的生产设备十分落后，大部分事情都靠人力。因为没有输油管线，生产出的石油，要先装进油桶才能运输出去。这些油桶，都靠人力滚进滚出，而油库又在半山坡上，山坡有四十多度的倾斜，即使一只空油桶，因为里边总有积油，也足有八十多斤重。从下往上滚，自然十分吃重，从上往下滚，更要用力抓牢，否则，只要稍一松手，油桶就会脱手而出，直冲坡下，如被石头撞坏，那就要大祸临头。每天我们一桶一桶不停手地滚，工头站在一边监督着，发现谁稍微松懈一下，就拳打脚踢鞭子抽。这样干完一天，累得腰酸背痛，上气不接下气，一躺下来就象骨头架全散了似的，动也不能动。

有一次，工头把我们带到一个建筑材料仓库，叫我们把那些青砖背到油库里去。青砖又厚又大，一趟背二十块，足有一百多斤重，他规定每人要背完十五趟才能结束。我背完了第十三趟，已经浑身无力，脊背上的皮也被磨破了，浸上汗水，就象伤口上撒上盐一样疼痛难忍。我忍着剧痛，硬撑着摇摇晃晃地向前走。走着、走着，突然眼前一黑，昏倒在地上，背上的砖头也哗啦一声落了下来，有一块砖正砸到头上，鲜血顺着脖子流下来。旁边的

伙伴们赶忙放下自己肩上的砖头来扶我，都被凶恶的工头用鞭子把他们打了回去。工头转过身来，就向我一阵狠命地抽打，还恶狠狠地骂道：“你这小子砸坏了砖，起码要扣两天工钱”。骂完就扬长而去。

伙伴们将我抬回破窑洞，幸亏有他们热情照顾，偷偷地给我送水送饭，躺了几天，伤势逐渐好了。就在这时，晴天一声霹雷，又一个灾难临到了我的身上。一天晚上，一个我不认识的工人慌慌张张地跑来，问我：“你叫王天贵吧？你父亲因为不能忍受工头的凌辱，顶撞了几句，被关进了矿警队，当夜在工友们的帮助下已逃走了。”我听了这个消息，差一点昏了过去。

## 一次事故尸横遍野

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控制的玉门油矿，从经营思想上说，只知搜刮掠夺，哪里管什么生产安全不安全？在企业管理方面，自然也是腐败不堪的。他们对油层资料不加分析，一味开采，发生了事故，也不总结经验教训，因而生产事故层出不穷。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就用枪逼着工人用生命去抢救，工人们去是送死，不去也会被他们开枪打死。因此，每发生一次重大事故，矿场上就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有一次，我们正在油库附近滚油桶，忽见油库对面的炼油厂烈焰腾空，一条条熊熊的火舌正向四面八方翻卷，霎时间叫喊声、爆炸声响成一片，“炼油厂油罐爆炸了！”

接着，只见如狼似虎的矿警队端着枪跑来抓人去灭火。于是，我们这些人就被他们用枪托和皮鞭驱赶到火场，他们逼着我们排成人墙，站在距离爆炸的油罐二十米左右的地方扑打烈火。烈火正在熊熊燃烧，怎容易扑得灭呢？不一会，我忽然觉得身上疼痛难忍，低头一看，原来身上的破布衫燃着了，刹那间头发也烧着了，亏得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叫我连忙在地上打滚，他又用泥土在我头上磨擦，总算我没有葬身于火海之中。我们整整扑打了一个多小时，大火才被扑灭了。但在灭火中共死伤了七、八十个人，还有一些人因反抗矿警队的驱赶被他们开枪打死了。

又一次，那时我已经不再做滚油桶之类的杂务工，改到井场上做了钻工。这天中午，我们刚刚吃完那发霉的小米饭，工头就吆喝着催我们上钻台，钻机隆隆地响着，旋转着的钻杆一根接一根地被提上来。忽然，“嗡”的一声响，泥浆立即进了出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不好！井喷了。”钻台上的人都慌乱起来。转眼功夫强大的气浪就窜过了二层平台，紧接着又越过了四十多米高的架子，情况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只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疾驰而来，原来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油矿经理已经闻讯赶到。这家伙一跳下汽车就暴跳如雷，疯狂地命令矿警用枪逼着工人跳进泥浆池里去抬钻杆，那时井喷的压力很大，只要碰到喷出的油、气、泥浆，即使不死也要受重伤，工人们怎能靠得上去呢？正当我被逼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冷不防被一个凶狠的矿警一脚踢进了齐腰深的泥

浆池里。我跌倒在泥浆里，嘴巴、鼻子、耳朵里都灌进了泥浆，一时连气也透不过来。接着，其他工人也都一个个被赶进来，我扶着别的伙伴挣扎着站了起来。就这样，我们艰难地干了四个多钟头，终于把那根五百多斤重的钻杆抬起来，压住了井喷。井是保住了，十几个阶级兄弟的生命却被这场事故吞殁了。这个油矿经理见井喷已经压住，对于倒卧在井场的一大堆尸体，看也不看一眼就乘上汽车走了。

象这类火烧、井喷等等的事故，在当时的玉门油矿是屡见不鲜、经常发生的。每一次事故，都是我们工人的一次灾难，都有大批的工人死亡。而事实上，这些事故大部分都是可以避免、或者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解放前的玉门油矿，单是由于发生事故欠下了我们石油工人多少血债啊！

## 永远难愈的心头创伤

发生了重大事故，工人要大量的死亡；而在日常生产中，由于他们不顾安全、不负责任，零零星星死亡的人数，又岂止千万？累计起来，恐怕要比葬身于重大事故的人命还多。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其中有些人并不是因事故死亡，而是被那些万恶的工头活活害死的。

有一次，我们在钻台上干活，工头叫我把封井器卸下来。我从地上捡起那根拉卸封井器的棕绳，发现已经有好几处磨损得很厉害，为了避免发生事故，就对工头说：

“这根绳子眼看要断了，换根新的吧。”工头听了，眼睛一瞪恶狠狠地说：“少废话，快卸下来。”我又辩解说：“这样会出事情的。”这家伙听了更加蛮横，皮鞭一扬喝道：“只要棕绳没有断就得用，再多嘴小心你的脑袋。”我见多说也没有用处，只得冒着风险把封井器慢慢往下卸，这时就听得棕绳咔咔地响。老工人吴师傅见到这种情况，就挺身而出，连忙用手去扶，在吴师傅和大伙的帮助下，封井器总算安全卸下了。可是，万恶的工头又逼着我们仍用这根快断的棕绳去甩钻杆。我们都说这根绳子无论如何不能用了，可这家伙仍然坚持非用不可。年高心善的吴师傅，为了爱护大家，冲在前头，小心翼翼地用这根绳子甩钻杆。第一根钻杆总算没出问题，但当第二根钻杆提起来刚要往外甩的时候，就听“嘣”的一声，棕绳断了。半吨多重的钻杆砸到吴师傅的腿上，吴师傅当场昏了过去。工头见果然出了事情，就招呼矿警把吴师傅抬了走，说是“送医院”。其实，哪里是什么“送医院”？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把吴师傅扔到荒山里喂狼了。

又一次，这天早晨我一起来，就觉得头脑发胀，四肢无力，饭也不想吃，我硬撑着走上钻台。老工人齐师傅见我面孔苍白，神色不好，就关切地说：“贵子，你怎么啦？吃不消到边上歇一歇，这些活我来干。”他一边说，一边从我手里夺过管钳，问：“哪颗螺丝松了？让我去紧。”我望着齐师傅慈祥的面孔，听着他那充满了友爱的声音，激动的站在一旁流泪。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时，猛听得“咔”

的一声，齐师傅手里的旧管钳裂坏了。我暗叫一声不好，一颗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只在这一瞬间，工头早已窜了上去，青铜木棍象雨点般的落在齐师傅的身上。工头一边打，一边叫着：“损坏工具要照价赔偿。”赔？我们这些一个月工钱只能买几根麻花的穷苦工人，能赔得起吗？就是整整半年的工资也不够啊！齐师傅气得面孔铁青，愤愤地说：“这管钳早就不能用啦，你看上面还有没有牙齿？”这家伙蛮不讲理地嚷道：“不管！是你弄坏了就得你赔。”齐师傅气得要拉工头到上面去评理。谁都知道，那时候哪有穷人讲的理啊？这家伙就把手一招，叫来了几个矿警，把齐师傅连拉带拖地押走了。齐师傅被押走后，我心里难过极了。齐师傅为了爱护我而引起了这场大祸啊！晚上，我坐在窑洞口，等着齐师傅回来，一直等到半夜，才见他两个矿警拖了回来，已被打得遍体鳞伤，蓝布衫上染满了鲜血。他躺到地上，已是奄奄一息，连一句话也说不出。这夜我难过的一夜未曾合眼，天一亮就又去上工了。我站在钻台上，心里老是惦念着奄奄一息的齐师傅。吃午饭时，我悄悄地把自己的两个小米饭团揣在兜里，偷偷跑回窑洞，走到齐师傅跟前，轻声地喊：“齐师傅，你吃点饭吧！”连喊了几声，齐师傅都没有应声。我忙上前去推他，却使我猛吃一惊，饭团骨碌碌滚到了地上，齐师傅已经含恨死去了。

矿场上被害死、被打死的工人是不可胜计的。但吴师傅、齐师傅的死，却在我的心头烙下了永远难愈的创伤。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每当我想起这两位为了爱

护我而丧失了生命的师傅，心头仍然感到一阵阵的疼楚。

## 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奔驰

夜再长，总有天明的时候。我们穷苦的石油工人，熬过了漫漫长夜，终于盼来了黎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玉门油矿。从此，革命的风暴驱散了漫天乌云，红太阳照亮了祁连山。

社会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油矿回到了人民的手里。昔日的穷苦工人成了油矿的主人。为了使这些穷工人当好家，作好主，党为我们开办了夜校。在夜校里，有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红军、老八路，给我们讲解革命的理论，还聘请了革命知识分子给我们上文化课。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们很快懂得了在旧社会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还有那些工头、矿警，为什么敢于那样蹂躏践踏我们，为什么我们穷人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吃苦受罪，根本原因就是由于那个吃人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啊！

由于党的教育培养，我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一九五〇年二月，在轰轰烈烈的反霸斗争中，我加入了党的行列，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在大跃进的年代里，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青海省柴达木油田，担任了钻井队长。一九六〇年，我又随着浩浩荡荡的石油大军，来到大庆，参加了夺取大庆油田的石油大会战。在这里，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发扬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同天斗，同地斗，同

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斗，艰苦创业，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拿下了这个大油田。

看看现在，想想过去，我们石油工人看到的变化，真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述不尽。我们拿今天的大庆油田和昔日的玉门油矿对比，不论在哪一方面，无不有天渊之别。解放前，钻机上的一切，甚至连一只螺丝帽，都得依靠进口；今天，从钻井架到每一只配件，都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解放前，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只顾搜刮掠夺，根本不谈什么安全生产，明知有危险，也逼着我们送命，多少工人惨死在钻台上，葬身于事故中；今天，我们社会主义企业，重视安全生产，加强劳动保护措施，我们工人都头戴铝盔，腰里系着尼龙丝的保险绳，脚上穿着护脚的靴子。解放前，我们工人生小病不敢讲，生了大病就扔出去喂狼；今天，我们享受劳保条例，再大的毛病，到医院看病都不要钱，还有红医工、巡回医疗队上门为我们服务，并有专门为我们工人设立的疗养院。解放前，我们住的是破窑洞，吃的是发霉的小米饭；今天，我们住新工房，井队里有更衣室、浴室，上下班还有专车接送，家家户户吃的饱、穿的暖。解放前我们象囚犯一样，上下工都有矿警押送，做工、吃饭、睡觉都有人监管，那里谈得上政治权利；今天，我们工人人人都是企业的主人，不少工人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拿我来说，从一个普通的工人，一直提升到钻井指挥部的党委副书记。

解放以后的这许多变化，是怎样出现的呢？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是由于毛主席、共产党的

好领导。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与我们永别了。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是后继有人的，我们又有了英明的领袖华主席。在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一伙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保卫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我们一定要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颗红心一双手，  
我为祖国献石油。  
激流任我跨，  
大地任我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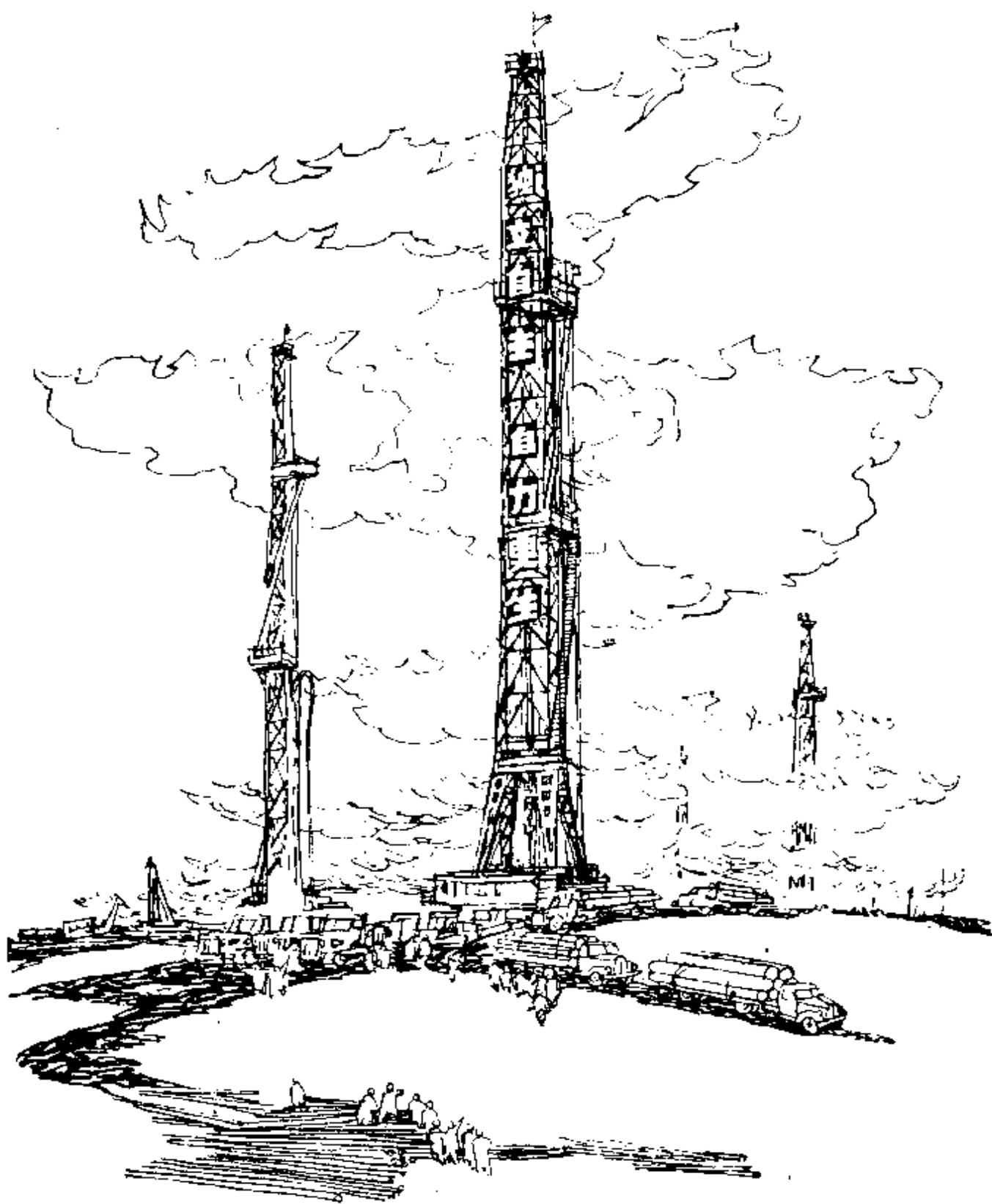
车厢里又响起了年轻人的歌声。听着他们的歌声，我笑着对他们说：“向前走吧！青年同志们，向前跑也行。但一定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向前走，要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向前跑啊！”

# 石油滚滚见太阳

——大庆油田勘探指挥部老工人王惠德讲家史

去年春天，我弟弟因公出差，来到大庆。我们这一对做了三十多年石油工人，同受旧社会折磨，共享新社会幸福的亲兄弟，今天在这里久别重逢，抚今追昔，真是喜悲交集，心里有多少话要讲啊！但是，我们一见面，就激动地热泪直流，拉着手久久不放，一句话也说不出。呆了半晌，还是我弟弟先开了腔。不过他没有先问好，更没有谈家常，而是急着要我介绍大庆的经验。当时大庆正在组织开发新区油田的大会战。我说：“百闻不如一见，还是先去看看大会战的热烈场面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会战前线。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雄伟壮丽的图景：茫茫的草原上，钻塔林立，红旗似海，人如潮涌，钻机声、马达声、号子声混合在一起，震天动地。一辆辆解放牌拖车，拉着粗大的油管，疾驰而过；一辆辆吊车，把国产的钻井设备从汽车上卸下来；一个个英姿飒爽的青年工人，驾驶着东方红牌推土机，正在平整场地；一座座巨型油罐，在电焊的火花中徐徐升起；二十来台拖拉机，拖着高耸入云的钻塔，在金色霞光



会战前线的沸腾景象

的映照下昂首前进……望着这热烈的战斗场面，我弟弟无限感慨地对我说：“哥哥，你还记得解放以前咱们在上海打井的情况吗？”弟弟的一句话，激起了我脑海中的万顷波涛，把我带回到遥远的苦难岁月……

## 井场血泪仇

那是一九四〇年，我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做苦工。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石油公司，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依附美帝国主义的势力搞起来的，并在江苏、四川、玉门等地设立了分公司。这些喝人血的家伙，当时梦想在上海打井采油，可是结果只打了几个干窟窿。

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劳动力最不值钱。我们做苦工的，从早到晚，出大力，流大汗，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拿到的工钱，还填不饱自己的肚皮，又要受工头的敲诈勒索，加上物价飞涨，哪里还能养家呢？我们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一年，我弟弟只有十六岁，看看没办法，就要和我一起去做苦工。我妈妈流着泪说：“孩子，等两年长高一些再去吧。”弟弟说：“在家饿得肚皮贴脊梁，去了也许能混口饭吃，总比在家挨饿好。”妈妈也无可奈何，心一横就同意了。我把弟弟领到石油公司，招工的头见我弟弟长得又矮又瘦，瞪起三角眼说：“小赤佬，没有桌子高，也想混饭吃，滚开！”其实，这家伙哪里是嫌我弟弟瘦小呀！后来，有人暗暗关照我：“当工头的，得不到你的好

处，即使是个彪形大汉，他也不会要。”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是故意刁难。想想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从穷哥们那里凑来些钱，买了几瓶烧酒，几条香烟，送给了招工的工头，他才勉强收下了我弟弟。

上工那天，弟弟刚好和我分在一起，在浦东打井。那时打井的设备破旧不堪，操作十分笨重，一个大轮盘绞动着钢丝绳，钢丝绳通过三十米高的井架牵动着钻具，七八个人推着大轮盘，就象推磨一样，干上一会，就累得你喘不上气来。我弟弟年纪小，又是初干这样的重活，怎能吃得消呢，干了一会，只见他满头大汗，面孔简直象淋了雨一样，有几次甚至昏倒在地上。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怕他累坏了，就抽空偷偷地嘱咐他，不要拚死拚活地干。穷哥们见他年纪小，也很爱护他，不要他干太重的活。这样勉强混了一些日子。不料，万恶的工头发现我俩是亲兄弟，就起了歹心。不久，就把我弟弟调到了大场的一个井队。弟弟到了大场，我更加放心不下，怕把他累坏了，更怕他出了事情，每天总是提心吊胆，可是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有一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子下班回到家里。一推门，发现我弟弟躺在地铺上，右腿绑着带血的绷带。我吓呆了，一下子扑在他的身边，问他是怎么搞的。当时他气得浑身发抖，面孔涨得通红，牙齿不住地打颤，半晌说不出话来。停了好一会，才断断续续地向我哭诉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弟弟到大场井队的第三天，工头看他年纪小，好欺负，就有意敲诈他。这天中午，工头把弟弟叫到跟

前，他两手叉着腰，嘴里叼着烟卷说：“小赤佬，你也和大人拿一样的工钱？没那么便宜。从今天起，老子扣下一半。”弟弟一听，气得火冒三丈，就说：“凭啥给你一半？”工头没有想到一个孩子竟敢顶撞他，顿时眼珠子瞪得溜圆，举起鞭子就打。在旁的工人看见工头又在打人，立刻围拢上来，大声喊道：“住手！你在一个孩子面前逞什么霸道？”工头见人多势众，只好罢休。

可是，在那虎狼当道的社会里，我们受苦受难的苦工躲过了十五，躲不过三十。第二天，狗工头就对弟弟报复了。他叫弟弟到离井架一百米外的地方去扛一根铁管，旁边的一个工人听了就说：“他力气小，我去扛吧。”那工头冷笑了一声说：“你力气大，不用急，一会有你使的劲！铁管子叫这小瘪三去扛。”说完，硬逼着弟弟去扛。那铁管长七、八米，碗口粗细，少说也有两百斤重。工头指着铁管，斜着三角眼说：“扛得动扛不动？扛不动就给老子滚蛋！”弟弟心里早就憋着一团火，他咬了咬牙，紧了紧腰带，鼓足了劲，一挺身，铁管颤悠悠地离地了。可是弟弟到底年纪小，力气不足，刚一迈步，只觉得两眼一黑，身子一打晃，就跌倒了，铁管子从肩上滑下来，刚好砸在右腿上，弟弟的腿被砸断了。

听完了弟弟的哭诉，我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就拿了一把菜刀，向井场奔去，不顾一切地要去和这个坏蛋拚命。几位穷哥们知道了，连忙赶来把我拦住，语重心长地说：“惠德呀，这个社会是他们的天下呀，你一个人去和他硬拚，不是白白地送死吗？”我听了穷哥们的劝告，只好

暂时咽下这一口气，但这粒仇恨的种子却深深地埋进了我的心灵。

## 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

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石油公司，在上海打井采油的美梦破灭了，又遇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得不草草收场。但是，在收场之前，这些喝人血的家伙，还不放过我们这些苦工，竟和重庆兵工厂勾结一起，采取极其卑劣的欺骗手段，做了一笔贩卖劳动力的肮脏交易。

一天，中国石油公司的一个代理人，把我们几十名工人叫去，露出一副阴险的笑脸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也算是你们运气好，本公司在重庆发现了石油矿，准备马上开采。你们愿意到那里去的话，工钱加一倍，一天两顿大米饭，每年还可以回家探亲一次。”我们听了，虽然都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但是，在那个社会里，工人找个饭碗真象登天一样难啊！不去就要失业。想到这些，都硬着头皮报了名。

没有几天，我们坐上一艘外国造的小轮船，到达了重庆。工头又把我们关进铁笼子般的卡车里，在崎岖的山路上跑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下了车，我们一看四面都是山，连钻井架的影子也没有，我们知道果然是受骗了。原来，这块地皮原属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所管辖，他们本想在这里打井采油，也曾瞎忙了一阵，同样也没有搞出名堂来，眼看捞不到什么油水了，就把这块地

皮卖给国民党的地方势力，在这里开办兵工厂。兵工厂需要劳动力，于是，就和这个所谓石油公司达成了这笔肮脏交易，把我们骗到了这里。

进了兵工厂，我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命运完全掌握在工头手里。有一天，工头叫我和另外两个工人去重庆拉粮食。汽车到了重庆粮库，两个押车的工头看见粮库对面有个饭馆，想去喝酒，就横着眼对我们三个说：“你们几个给我老老实实地装车，谁要想跑，回去就关进水牢。”说完两个工头就上饭馆去吃喝了。我们三个人就忙着装车。忽然，有一个高大的汉子，从我身边走过，顺手塞给我一张报纸，还没等我看清这个人的模样，他就已经匆匆离去，不知去向了。旧社会剥夺了我学文化的权利，斗大的字我也识不得几个，根本不知报上面写的什么，便折了折装进了兜里。就在这当儿，一只长着黑毛的大手伸了过来，从我衣兜里把报纸抽了去。我抬头一看，是个头戴礼帽，眼戴墨镜，身穿大褂的家伙。心想：糟了！不出所料，他哨子一吹，从巷子里跑出三个穿着黑色便服的狗腿子。不由分说，就七手八脚地将我绑了起来，把我推上一辆警车，押到一座阴暗潮湿的房子里，用绳子把我吊起来，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和哪些人来往，给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送了什么情报。这时，我才知道我手中的报纸，原来是《新华日报》。我怒视着这帮不抗日专门欺压老百姓的反动家伙，冷冷地说：“我是兵工厂来拉粮食的，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见我一问三不知，挥起鞭子就使劲地向我身上抽打，还给我安上“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他们连续

折磨了我三四天,打得我遍体鳞伤,看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把我关进了监狱。过了几天,我得了伤寒病,瘦得皮包骨头,背上的肉都躺烂了,只剩下奄奄一息。狗特务就把我扔到了荒山沟里去喂狼。一阵凉风把我吹醒了,睁开眼一看,四面都是高山,荆棘遍地,时而传来野兽的嗥叫。这时,我又气、又恨、又急,难道我就这样结束了一生吗?不!我要报仇,要雪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也要争取活下去。于是,我就忍着痛,极力挣扎着,在荒山的野草丛中爬呀爬,汗珠从我的额上直往下淌,身上的鞭痕,背部溃烂的地方,被汗水一腌,就象火烧火燎似的钻心痛,二十四根肋骨也象散了架,每个关节都好象脱了臼,我爬了没几步就又昏了过去。等醒来时,已经躺在一张破床上。原来是一个穷人上山打柴,发现了我,把我背回他家里。在这位好心人的精心护理下,我渐渐恢复了健康。

我感谢这位恩人,救了我的命。可是,今后怎么办呢?真是走投无路啊!一天,我在重庆街头踟蹰,遇到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女乞丐,仿佛有些面熟,我再仔细一看,啊!真把我惊呆了,这不是我的老婆吗?她面黄肌瘦得不成人样,我几乎认不出来了。这时,我老婆也认出我来了。不用多说,只看模样,就知道都是从死里逃生的。我们面对面的哭了好半天,我老婆才呜呜咽咽地告诉我。我离家以后,一连几个月没有音讯,一家人都挂念得不得了,母亲急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眼睛都快哭瞎了,所以我老婆决定到重庆来找我。她爬上了一艘难民船来到重庆,本来她只知道我是来打井采油的,可是,重

庆人谁也不知道哪里有什么油井啊！因此，她一边讨饭一边找我，一天天过去了，仍然打听不到我的讯息，她急得几乎发疯了。就这样，我谢了那位救命恩人，然后和我老婆一起，又爬上难民船，回到了上海。

这时的上海，已经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民族的屈辱，政治的迫害，经济的压榨，把上海的劳苦大众折磨得活不成、死不了。在这灾难深重的环境里，哪有我的活路？回到上海后，一直没有找到饭碗。为了养家活口，我和弟弟每天只能东奔西跑，这里混两天、那里干三天，一家老小，成年累月，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可是，一连串的灾难还残酷无情地不断向我袭来。我的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连饿加病，活活被夺去了幼小的生命。这沉重的打击，就好象割去了我的心头肉啊！激起了我数不完、说不尽的旧恨新仇。我恨那个吃人的社会，更恨那些横行霸道的魔鬼。我望着怒涛滚滚的黄浦江，心头的仇恨比江里的怒涛还多。我要报仇，我们千千万万的穷人，一定会把心头的仇恨汇成怒涛滚滚的江河，把那吃人的社会冲毁、淹没。

## 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东海再深也有底，长江再长也有头。

一九四九年初春，寒冷的冬天过去了，和煦的春风带来了喜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而解放江南的战役也已迫

在眉睫，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我们劳动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苦难的日子快要熬出头了。

但在这以前，由于抗日战争胜利，随着国民党劫收大员飞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又神气起来，重做起在上海采油的美梦，并居然真的招起工来。当时，我失业在家，正愁得没办法，为了混饭吃，不得不又进了这个石油公司，干起老行当来。这时候，因为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的影响，以及将近十年亲身遭受的种种压迫、剥削、欺骗给我们的教育，使我们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我们已经不象当年那样任人宰割、任人摆布了。大家都已经看出蒋介石王朝的统治长不了啦。我们工人团结在一起，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上班，我们出工不出力，工头在我们就磨一会，工头不在就怠工。这样钻井的进度就更为缓慢，气得那些工头双脚直跳，不住地威胁我们说：“三个月打不出一口井，你们谁也别想活！”还动不动就抡起鞭子打人。我们心想：别看你们现在猖狂，不过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好蹦了。

一天，已经深夜十一点多钟，再过半个小时就要下班了，我们一个个饿得肚子咕咕直叫。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工人，患着严重的肺结核病，身子非常虚弱，这时他正在摇笨重的绞车把，摇着，摇着，实在摇不动了，突然晕倒在摇把上，正好被工头看见，这家伙就抡起皮鞭猛地抽过来。沉重的手摇轮从他手中脱开，钢丝绳带着沉重的钻具飞快地落下来，手摇轮也跟着飞快地倒转，那位老工人躲闪不及，摇轮把柄一下子打在他头上，顿时脑浆迸出，

当场死亡。工头见势不妙，慌忙逃走。我们在场的十几个工人，怒火满胸膛，扔下工具，就去找公司的代理人算账。但是，这些反动的家伙不但不理，还恶狠狠地说：“没有力气混饭吃，死了活该！”这句丧心病狂的话，激怒了广大工人，于是压在工人们心头的仇恨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越来越多的工人要去找这些家伙讲理。接着，我们举行了罢工。工人们愤怒地高呼：“惩罚杀人凶手！”石油公司的代理人一看工人们要造反，急忙向反动警察局告急，警察局马上出动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反动警察赶来镇压。面对着这群吃人的豺狼，我们面不改色心不跳，几百名工人一涌而上，把他们团团围住。公司的代理人见势不妙，生怕事情再闹大，就急忙假惺惺地答应惩办凶手。还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的要求。通过这次罢工，工人们看到团结起来的力量，并体会到：只有斗争，才有活路！

## 天翻地覆慨而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我们这些在旧社会做牛做马的穷苦人民，兜底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不久，一小撮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就被赶出了祖国大陆。蒋介石王朝被彻底摧垮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地飞跃前进。为了改变我国一穷二白

的面貌，新中国十分重视发展自己的石油工业，这样，我和弟弟响应党的号召，投入了开发石油大军的行列。我们虽然仍是个石油工人，但地位不同了，工作的意义也不同了。过去我们是富人的牛马，今天是国家的主人。过去做工是为了养家活口，今天做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我奔赴到祖国的大西北，来到了位于革命圣地延安的延长油田。我弟弟则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这一对在苦难中长大的同胞兄弟，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分手了。

在延安的日子里，白天我们打井采油，晚上，在枣园夜校学习政治，文化和技术。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革命集体生活，就使我懂得了许多过去根本没有想到的道理，懂得了在旧社会我们为什么受苦，今天为什么幸福；这使我从内心里真正感到：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千言万语表达不出我对党的衷心拥护，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在旧社会深深埋在我心灵的一颗颗仇恨的种子，今天却变成了我大干社会主义的力量泉源。为了建设新中国，为了让我们子孙万代不再受苦，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哪里还怕什么吃苦受累？我觉得浑身是劲，气力和精力都比过去大了十倍，百倍。我努力地学习和工作。领导上看我表现不错，培养我，叫我学司钻，扶刹把。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但又很担心，石油行业有句俗语：“司钻手里三条命”。就是说，人、机器设备和井的存亡，都在司钻的手里。就在这时，一件往事涌现在我的眼前：那是在上

海打井的时候，有一天，那个公司有个什么“大人物”来工地“视察”，我因为钻机操作笨重，问了一声能不能换部电动钻机，他面孔一板，轻蔑地说：“大字不识的苦工还想开机器？先去读完十八年的书再说。”十年过去了。我所受的这种侮辱却一直烙在我的心灵深处。现在，党真的培养我做司钻了。我怎能辜负党的期望？为了报答党的恩情，为了替穷苦的工人争气，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扶刹把。没有文化，我可以刻苦地学，没有技术，我可以努力钻研嘛。就这样，我白天学，晚上钻，苦学苦钻。有一天晚上，同志们都睡着了，我一个人跑到钻台上，摸索着指重表与各种地层变化的关系，我一抬头，忽然发现老队长来到了我的身边，我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日日夜夜苦学苦钻，原来老队长也在日日夜夜地关心着我啊！我感谢老队长，更感谢毛主席。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才会有这样的事情。有老队长的热情传授，经过两个多月的刻苦学习，我很快就能够独立操作了。谁说大字不识的苦工不能开机器？昔日的穷工人，泥腿子，大老粗，今天硬是成了人民的司钻。不仅如此，在党的培育下，不久我又担任了钻井队队长。接着，我日盼夜想的一天到来了。党批准了我的要求，吸收我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在党旗下，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党给了我新的生命，从今以后，我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党的。我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献给了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我和战友们一起到了祖国的东

北，参加了松辽盆地(就是现在的大庆)的勘探工作。在这千里冰封的草原上，我们架起了一座座钻塔，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夺取油田的大会战。当时，正是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时期，帝修反奏起了反华大合唱，并妄图用石油卡住我们的脖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铁人王进喜喊出了“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把石油落后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的豪迈的口号。当时的条件确实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为了挫败帝修反的阴谋，捍卫我们的红色江山，再大的困难我们敢上，再大的苦也不放在眼里。我们头顶青天，脚踏草地，风餐露宿，没日没夜的拚命干。设备进不了井场，我们就人拉肩扛，踩着没膝深的泥水，抬进去。

一次在搬运钻杆过程中，我在旧社会留下来的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病复发了，领导和同志们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治疗。这时我想到解放前做苦工时，胃病发了，痛得我在地上打滚，工头却恶狠狠地踢我两脚，骂我是“黄病鬼”，因为一天没出工，竟扣了我一个月的工钱。现在，正当党需要我拚命大干的时候，我怎能躺在这里疗养呢？我向医生要求出院，医生不同意，我就趁医生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跑回了队。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我们的大会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高速度、高质量地拿下了我国第一个大油田。通过这场会战，我们不仅打出了滚滚的石油，还打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打出了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石油工业的道路，打出了石油工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水平。这是帝修反以及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做梦也

想不到的！

在中国石油自给的凯歌声中，我光荣地出席了松辽勘探局召开的群英会。当群英会结束，我满载着大会对我们的期望刚刚回到了工作岗位的时候，没有想到一个更为繁重的担子压到了我的肩上，党组织让我担任勘探指挥部的副指挥。当领导同志要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的时候，我非常不安，心里想：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有限，能够负担起这样一个繁重任务吗？能够把工作做得好吗？但是，我认识到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只要革命需要，再重的担子我也要承担起来。这样我这个旧社会的苦工，就成了勘探指挥部的副指挥。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参加了大庆党委组织的学习参观团，向兄弟单位学习。我们在兰州炼油厂和兰州化工厂学习了先进经验以后，乘坐飞机飞回大庆。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翱翔在红日高悬的蓝天，俯视着祖国的锦绣山河，只见铁路纵横，厂矿毗连，塔囱林立，还有那麦浪翻滚的一望无际的庄稼……不禁使我浮想联翩。面对着美好的现实，回想起苦难的过去，又想到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还在阴谋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想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是的！我们要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牢牢记在心里，阶级斗争一分钟、一秒钟也不能忘啊！

嘀、嘀、嘀……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把我从回忆中拉回来。我扭头一看，一辆大型拖车，拉着一部崭新的

国产钻机正向着我们开来，弟弟拉着我赶忙闪在一边。原来，就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要打一口高产油井。弟弟望着我呆呆出神的样子，问我道：“哥哥，你在想什么呀？”其实他还用问吗？我们这一对同甘共苦的亲兄弟，虽然阔别了二十多年，由于所走的道路是完全相同的，有谁还能比他更了解我此刻的心情？我们久别重逢，确实有许多话要讲，可是，千句话，万句话，并成为一句话：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好领导。过去国民党妄想打井采油，闹了多年，什么名堂也没有搞出来。我们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就让这滚滚的石油见到了太阳，让大量的地下宝藏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石油工人，也是被毛主席、共产党从人间地狱里拯救出来，得见天日。现在我们虽然取得了成绩，但革命的道路还是漫长的。今后，我们一定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 永不忘本干革命

——大庆石油化工总厂“一心为公的好干部”

李景荣的家史

农历除夕的晚上，正当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欢度春节的时候，在零下三十度严寒的北疆雪原，一辆十轮大卡车，载着一台大型的化工设备，跨过松花江，顶风驶向大庆油田。

卡车上站着一个人，手持竹竿，不时地挑起公路上横空而过的电线，好让车上八米多长、四米多高的设备顺利通过。他的棉工作服上披着一层积雪，狗皮帽沿上挂着一串串冰凌。凛冽的北风吹到身上，就象浑身浸入冰水一样透心彻骨。不时高举的双手已冻得麻木了。只见他一会儿跺跺脚，一会儿搓搓手，以顽强的毅力与严寒搏斗着。这个人，就是大庆党委、大庆革委会授予“一心为公的好干部”称号的李景荣，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的党委副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

两个司机坐在驾驶室里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知道李景荣也是一个好司机，他们怕把老李冻坏，一再要求三个人轮流站在车上，但都被老李坚决地拒绝了。

“多么好的干部！多么好的同志啊！”

“到底是出过大力、吃过大苦的人。”

司机的议论是有根据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李景荣所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

## 灾难深重的童年

李景荣的老家，是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集镇上。爸爸在镇上打零工，有时给人家烧窑，有时拉车，整天劳累、奔波，一家人仍吃不饱，穿不暖，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不得已，把大姐、二姐卖给了人家。虽然减少了几张嘴，一家人还是有了上顿没下顿，无法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爸爸只得忍痛抛下一家老小去鹤岗煤矿谋生。

景荣的爸爸一走，家里更没法生活了。妈妈整天给人家缝补衣裳，做零活。拚死拚活地挣扎了几年，再也活不下去了。妈妈就拖着大哥、二哥，抱着小景荣，到鹤岗煤矿找爸爸。他们来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鹤岗煤矿，只见到处拉着铁丝网，满街是要饭的花子，街边荒沟里，成群的野狗争着吃腐烂的尸体，那些挎着洋刀的日本鬼子和手拿棍棒的工头，横行霸道，任意杀害、打骂矿工。看到这悲惨的景象，吓得小景荣把头藏进了妈妈的怀里，什么也不敢看。他们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找到了爸爸住的地方，那是一处破烂不堪的矿工棚。

这时，爸爸正在矿井干活，他们母子就站在屋檐下等着。不久，就从那些爬出矿坑的衣衫褴褛的人群中，看见

爸爸气喘吁吁地走过来。这时，爸爸也发现了老伴和孩子们，猛地吃了一惊，呆了半晌才说：“你们怎么来了？矿上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啊！早晨下井就不知道晚上能不能活着出来，几次冒顶塌矿，我差一点被砸死。真是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底下才是咱们矿工啊！”矿上的工友们知道景荣的一家来了，都跑来热情地帮他们料理，在大家的帮助下，景荣母子总算能在一间破烂的矿工棚里住了下来。一家人就这样开始了新的苦难生活，爸爸和大哥在矿上做工，二哥在矿上当学徒，幼小的李景荣也跟着矿上的孩子们去拣煤渣，拾垃圾。

李景荣十二岁的那年，就进矿当了童工。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尝到了阶级仇、民族恨的辛酸滋味。有一次，一个日本鬼子因为屋里的开水吃光了，就嗥叫起来：“叭嘎牙路！水的没了，快快地有。”李景荣慌忙提着水壶去灌开水，当他提着一壶开水回来的时候，刚登上台阶，由于身体虚弱，加上跑的过急，突然一阵晕眩，连人带壶跌倒在地，一壶开水浇在他的脸上，脸被烫的红肿了，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钻心的疼啊！李景荣在地上疼的直打滚，日本鬼子还“叭嘎牙路！叭嘎牙路！”一声接连一声地嗥叫。

不料祸不单行，就在李景荣被烫伤不久，另一个灾难又临到了他们家里。李景荣的二哥在矿上干木工活，他年纪轻，性子强，忍受不住工头的欺压，常常和他们顶撞，工头怀恨在心，处处寻隙挑衅。一次，工头叫他扛木头，一根木头二百多斤重，他人还小，那里扛得动？不得

已，硬撑着扛起来，咬紧牙关向前走，累得满头冒出豆大的汗珠，走了一段路，实在走不动了，想休息一下，刚把木头从肩上放下来，猛然啪地一声，一根鞭子抽在他的脊背上，接着就噼噼啪啪地一阵乱抽，打得他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上，半天不省人事。后来工友们用木板把他抬到家里，从此躺倒不起，连病加气，不久就死了。临死之前，迷迷糊糊地叫着“报仇！报仇！”在一个秋风萧瑟的黑夜，景荣的一家把二哥的尸体埋葬在荒山坡上，妈妈哭得死去活来，李景荣当时虽然年纪还小，但已经记下了这笔永生不忘的血海深仇。

## 悲惨的学徒生活

血的教训使李景荣的一家更加清楚地看到鹤岗煤矿是一座吃人的魔窟。妈妈说什么也舍不得再叫景荣到矿上干活了，就到处求亲告友，终于把他送到了哈尔滨，进了一个资本家开的仁和铁工厂当学徒。

其实，在那个社会里，穷苦人民到哪里去找安乐窝呢？李景荣一进厂就听到工人们说：这个厂的资本家，把工人看得牛马不如，把钞票看得比生命还宝贵。“仁和”，“仁和”，资本家就是不叫“人活”。李景荣是个新来的学徒，待遇自然要更加苛刻了，甚至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在厨房的屋梁下，吊起了一块木板就算是李景荣的床，板上铺点柴草，就算是垫被，活象那吊在屋檐下的“鸽子窝”，上半夜遭受烟熏火燎热气蒸，下半夜又冻得直打哆嗦。李

景荣在仁和铁工厂名义上是学徒，实际上是资本家的奴仆。劈柴、烧水、做饭、抱孩子、洗尿布、拖地板、推磨，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全厂几十个人吃的粮食，全由这个十四岁的孩子磨出来，而且还常常遭到毒打，根本不让他学手艺。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叫李景荣去工房干点下手活。

李景荣到了工房，工头就叫他拉大炉子旁边的一只风箱，这只大风箱拉起来足有二十多斤重，他用两只手，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能拉动，连拉几下，就累得喘不过气来。有一次，正是夏天中午，资本家叫 he 到三里地外去背机器部件，他赤着脚，光着膀臂，在烈日下来回背了七、八趟，每趟都背着五十多斤重的东西，好不容易背完了，连气还没有喘一口，工头又逼着他去拉风箱。他手拉着风箱，就觉得头昏目眩，突然，眼前一阵金星乱冒，脑袋嗡地一声，身体扑倒在大风箱上。这时，工头斜着眼睛，看到李景荣晕倒在风箱上，非但不去抢救，却从炉膛里抽出一把火钳子，凶狠地向李景荣打去。火钳子打在李景荣的右胳膊上，只听“嗤啦”一声，接着就是一股刺鼻的油烟味，伴随着一声吓人的惨叫声，从炉旁传出来。残暴成性的工头却还在骂道：“穷骨头，看你还敢偷懒不？”李景荣气得浑身发抖，牙齿紧咬着嘴唇，血也被咬出来了，就想冲上去和工头拚命，却被别的工友拉住了，说：“这样干不行啊！”李景荣想想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忍着钻心的疼痛又拉起风箱。

李景荣在“仁和”苦受了两年。一天，家里托人捎信来说：爸爸病重了，叫他回去。景荣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急

得就象火烧，巴不得一步跨进家门。可是，资本家却百般刁难，说什么也不准他回家，要不就得赔偿两年的饭钱。替他当了两年牛马，分文不给，倒还要赔他的饭钱，这是什么歪道理啊？真是一伙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但是，和他们讲理是没有用的，就只好又托人说情，总算冲出了仁和铁工厂的大门，奔回家里。

李景荣回到了鹤岗，推开家门，只见面黄肌瘦的爸爸，气喘吁吁地病倒在床上。李景荣看到了久别的亲人，望着家里这种悲惨景况，想着两年来饱受辛酸滋味，忍不住地扑倒在爸爸怀里嚎啕大哭起来。

从这以后，李景荣结束了苦难的学徒生活。

## 黎明前的斗争

李景荣为了服侍爸爸，决定不再去哈尔滨了。但生活问题怎么解决呢？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再次进入鹤岗煤矿做工。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已是日落西山了。他们在各个战场上，都已经濒于绝境。但是，为了挽救即将灭亡的命运，他们就更加疯狂，更加残忍。日本鬼子统治的鹤岗煤矿，对工人的压制也更加严重了。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行动，煤矿设立了所谓“矫正院”。只要有人对他们的残暴行为稍有不满意的表示，都会被送到“矫正院”里进行“矫正”。所谓“矫正”，就是严刑拷打、灌辣椒水、上老虎凳、钉竹签等等。很多人被他们“矫正”得半死不活，

就被扔进了万人坑。

李景荣回矿上工的第一天，刚走到路上，就看见矿警队赶着一大群人，从“矫正院”抬出十来具冻得僵硬的尸体，每个尸体的脖子上，还挂着牌，向着万人坑走去。李景荣望着这些无辜受害同胞的尸体，想到那白骨累累的万人坑，愤怒、仇恨、悲痛，各种各样的情感交织在心头，使他感到难以形容的痛苦。一路上他不住地叮嘱自己：“我是又回到了这吃人的魔窟、穷苦人的陷井呀！在这里，随时都有可能遭到飞来横祸，小心啊！……”

可是，进矿上工以后，使李景荣感到出乎意外的是：工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两年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尽管日本鬼子的统治更加严厉了，对工人的迫害也更加残酷了，但工人们却并不再象过去那样怕他们，甚至还敢于和他们顶撞，工人们还常常偷偷聚集一起，谈论日本鬼子快要垮台的消息。有一次，当景荣和工人们正在兴奋地交谈的时候，突然，一个日本鬼子一脚踢开门闯了进来，一看大家都没有干活，举起灌满了铅的棍子就要打人。不料，工人们不但没有跑开，而且一齐围了上来，一个个横眉怒目，齐声喝道：“不准打人！”日本鬼子见到这种情况，感到形势变了，就不敢再象过去那样蛮横无理，一边嚷着：“矫正院的有！矫正院的有！”一边就滑脚溜走。

这些可喜的现象，使李景荣受到了鼓舞，也增强了勇气。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和大家一起，和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仿佛觉得穷苦人民的苦难日子真的熬出了头。



工人们横眉怒目，反抗日本鬼子的压迫

不久，李景荣的希望就成了现实，鹤岗矿工终于熬过了漫漫长夜，迎来了黎明的曙光，鹤岗解放了。

## 翻身不忘当年苦

解放以后，和千千万万穷苦人民一样，李景荣一家起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被旧社会折磨得只剩奄奄一息的爸爸，由于得到了很好的医治，不但恢复了健康，而且重新返回劳动岗位。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在呼兰找到了两个被卖掉的姐姐，一家骨肉重得团聚。哥哥在党的培养下进步很快，当了干部。而李景荣自己，早在鹤岗市的时候，就被评为市的劳动模范，入了党，不久也当了干部。一九六一年，到了大庆参加石油会战，从运输科长、运输处长，一直提升到大庆油田党委委员、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的党委副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获得大庆党委、大庆革委会授予的“一心为公的好干部”的光荣称号。解放前后的这些变化，在李景荣苦难的童年时代真是连做梦也不可能梦见啊！

一个人真正懂得珍视今天的幸福，就不会忘记过去所受的苦难。李景荣正是这样，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他从当了干部的第一天起，就经常告诫自己，职务变了，地位变了，思想作风不能变，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决不能丢。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身带五件宝：书包、扁担、扫帚、铁锹和镐头。甚至生了病住进医院里的时候，每天早晨也帮助



服务员拖地板、擦桌子、洗枕巾、洗床单。有一次，李景荣生了严重的喉头息肉病，头发胀、脸浮肿，发音困难，还经常晕倒。组织上三次安排他到北戴河疗养，他都坚决不去。党组织不得不作出决定，下命令叫他在家休养，他才接受下来。但在休息期间，每天却扛着粪勺到家属区厕所里掏粪，共积了二百多吨粪肥。很多群众说：“老李病休三个月，干了九十天的活，这算什么休息啊？”

李景荣在工作中，处处以铁人为榜样，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哪里最需要，就战斗在哪里。装卸器材的时候，他是搬运工；运输紧张的时候，他是驾驶员；车辆检修的时候，他是修理工；接送上下班职工的时候，他是服务员；擦汽车的时候，他又是清洁工。一年到头总是清晨四、五点钟就到车场、工地，晚上顶着月亮、星星回家。甚至假日也是如此。一九七六年元旦过后不久，李景荣在医院里动完手术出院刚刚六天，他不顾病后身体虚弱，就带着一个车队到大兴安岭站河林区去集运木材。一路上他发现二十多处险桥和铁路岔口，因为斜坡较陡，一场大雪过后，更加路滑难行，容易发生翻车事故。一到林区，他就动员了十几个同志，组成一支临时修路队，又亲自带队跑到这些地方，在斜坡上撒上炉灰渣，沟边打起树桩，用石头砂子把坑坑洼洼铺平，保证了车辆行驶安全。

李景荣担任了领导工作后，更加自觉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非常珍视人民交给他的神圣职权，一心为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决不利用职权为私人干事，更不能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他说：“我们的权力

是人民给的，因此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多年来，他管着大小汽车一百多辆，从没有为私事用过一次车，也没有让司机顺便捎过一样东西。有一次，他母亲患了直肠癌，要进医院动手术，管车的同志知道后，就安排了车子送他母亲到医院，但被他坚决谢绝了。结果由他自己背着老母亲，步行了一里半路，送到医院。又有一次，李景荣的女儿去哈尔滨看病，听说这天运输处有车子去拉货，就顺路搭乘了去拉货的车子。事后李景荣知道了这件事，严肃地批评了女儿，并在职工大会上检查了自己对孩子教育不够的缺点。还有一次，外省一个兄弟单位，借用运输处的车子，装运了一台锅炉，非常感激李景荣的热情帮助，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单位有同志出差来到大庆，顺便给老李捎来了一些礼物，当老李不在家的时候，硬是放到了老李家里。李景荣回家看到了礼物，坚决要退回去。而这时捎来礼物的同志已经离开大庆返回自己单位去了。李景荣并不因此罢休，就把这份礼物装进木箱，通过邮局寄了回去，并写了一封信，婉言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李景荣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以这样的标准希望着别人。是他向运输处党委提议，根据大庆领导干部的“约法三章”，制定了运输处领导干部的“三条纪律”：一是“三老四严”，脚踏实地跟群众一起干；二是不搞特殊化，不私自用车；三是不走后门，不让司机从外地给自己捎东西。李景荣说：“不正之风决不是什么小事情，它是对我们革命队伍的腐蚀剂，如果在这方面失掉了警惕，我们的头脑就会变修，我们的国家就会变色，我们穷苦的劳动人民就

要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了解了李景荣同志的生活经历，就可以看出：李景荣同志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决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正象两位司机同志议论的那样，他过去出过大力，吃过大苦；但更重要的，还由于他懂得应该怎样珍惜今天的幸福，懂得继续革命的重要意义。时时提高警惕，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因而就能使自己永葆革命的青春。

# 学院的新主人

——大庆石油学院马列主义学习班党支部书记  
管恩海讲家史

一九七六年三月的一天早晨，我肩负着党所交给我的新的战斗任务，拎着书包，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大庆石油学院”的大门。学院的教师和同学，一个个迎上来，亲切地和我打招呼，紧紧握住我的手说：“管师傅，我们革命师生欢迎你。”当天学院为我举行了热情洋溢的欢迎会，同志们都叫我谈谈感想，可是，我怎能用简短的语言，表达出感慨万端的心情呢？我想说的话很多，千言万语不知从哪里说起。这时，一件难忘的往事，浮现在我的脑海。那还是在我的童年时代，一天，我光着膀子，赤着脚，上山拾柴，路过一所地主办的小学校，听到教室里传出学生们的念书声。我是多么羡慕这声音啊！我背着柴禾，靠近教室，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出神地看着。哪想到教书的人是村里王地主的三弟，他看到我在窗口张望，就悄悄地走到我的身后，用铜尺向着我的头盖骨猛敲，我的脑袋被他敲裂了一条口子，顿时晕了过去。有人告诉了我娘，我娘赶到学校，把我背了回来。等我醒来以后，我娘哭着对

我说：“孩子，学校可不是咱们穷人去的地方啊！”从这以后，学校的大门，我就只能远远地望着了。

今天，我这个昔日的放牛娃，不但进了学校，而且进了高等学府，这真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啊！

进了学院以后，我担任了马列主义学习班的党支部书记。从放牛娃到大学里的干部，这是一条象神话一样的生活经历啊！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照耀下，这种“神话”竟成了现实。

## 为活命全家逃荒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无棣县后庄。一九三五年，这一带遭到了特大旱灾，从春到秋，没见一滴雨水，方圆几十里内，庄稼地块块都干得冒烟，作物全部旱死了，家家颗粒无收。那些地主老财还要乘人之危，逼租要债，敲诈勒索。为了活命，穷人们都外出逃荒了。我爹领着我娘，两个姐姐和我们三个兄弟，全家七口人，走了半年，步行一千多里，到了辽宁抚顺，投奔到二舅家里。

我二舅是靠给日本人修水坝养家。他拚死拚活地干，一天挣的工钱，只能换上二、三斤橡子面。我们到了他家，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人，困难极了。两家十四口人，挤在一间草房里，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到晚上，炕上睡不下，大点的小孩都披着破麻袋片，抱成一团，睡在地下。东北的腊月天真冷啊！我一夜就冻醒几次。特别是下半夜，全身哆嗦个不停，上下牙齿直打架。但更发愁的还是全

家揭不开锅。我们来到二舅家不久，连烂白菜叶也吃不上了。没办法，一家人迎着风雪严寒，每天流浪街头乞讨要饭。

第二年春，我爹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弄来几根木杆，在村东河边搭了一间茅草窝棚，一家人好歹住了进去。后来我爹又托亲找保，才能跟我二舅一起去给日本鬼子修水坝。上工第一天，我爹跟着二舅去找工地管事的人报到。一个三十多岁的日本鬼子，把我爹上下打量了一番，眯着一只眼睛，狞笑着问：“你的力气大大的有？”他说着就向前跨了一步，猛地给我爹当胸一拳。我爹没提防，身子不由往后摇晃了一下，才站稳脚跟。这时，鬼子又拿起皮鞭，使劲在空中挥动，发出“嘣嘣”的响声。二舅怕我爹不明“规矩”惹事，赶紧拽住他的袖口说：“走，干活去。”二舅告诉我爹，这个鬼子叫山本，是工地上最大的监工。他心狠如狼，对新来的工人都要先来这一手，目的是要工人服服帖帖听他使唤。

## 忘不了的阶级仇、民族恨

我爹到这种地方干活，真象跳进了火坑，一家老小都为他提心吊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大祸临头。但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我爹身体不好，一上工就感到头晕目眩，全身支架不住，他正想坐着歇一会儿，这时，山本来到工地，东吆西喝，挥鞭威胁。我爹只好硬撑着一连挑了四担土，已经筋疲力尽，实在挑不动了，第五担土就

少装了些，刚要上肩，山本好象一只恶狼一样突然窜到我爹跟前，瞪起贼眼把我爹肩上的扁担推掉，破口大骂：“你良心大大的坏，扣工钱的有。”硬逼着我爹把土装得凸起来，我爹刚把土筐挑上肩，忽然“咔嚓”一声，扁担断成了两截。这下可激怒了鬼子，他上来不由分说就拳打脚踢，把我爹的上衣撕成了碎片。我爹怒不可遏，一把抓住鬼子的胳膊，问他：“你凭什么打人？”鬼子嚎叫着：“你的，干活的不愿意，扁担的坏了坏了的。”说着，又举起鞭子朝我爹劈头盖脑地打。我爹忍无可忍，挥起拳头照鬼子打去。鬼子“哎呀”一声，捂着胸口摔在地上。这时，两个狗腿子闻声赶来，把我爹按倒在地上。鬼子爬起来，命令狗腿子解开筐上的麻绳，把我爹捆起来，吊在一根电线杆上，用皮鞭狠命抽打。我爹被打得浑身上下到处是血。鬼子越打越凶，这时，工地上不知谁大声地喊：“打死人了。”干活的人一个个扔掉手里工具跑来，我家邻居张大伯最先赶到，一把揪住鬼子挥动皮鞭的手，气愤地问：“你为什么打人？”这家伙傲慢地说：“他的干活的不好，扁担坏了坏了的。”还胡说什么“中国苦力大大的有，你们不干，还有大大的来。”大伙听了这些话，肺都气炸了。张大伯一时激动，攥起拳头朝鬼子的胸口打去，大伙也都一起冲上来，喊着“打！打！”鬼子见势不妙，吓得头也不敢抬，揉着胸口和狗腿子们悻悻地逃走了。大伙把我爹从电线杆上解下来，张大伯背起我爹就跑。

这天晚上，我娘煮好野菜，等着爹带回橡子面下锅。可是，直等到天大黑，还不见回来。一家人都急得直发

慌。我们等啊！等啊！等到半夜，才看到了有个人影在远处摇晃着。我连忙迎上去，果然是张大伯背着我爹回来了。原来张大伯把我爹从工地背走后，怕鬼子追捕，先藏到水坝下游河边，等到这个时候才敢回来。张大伯把我爹放在炕头，含着泪对我娘说：“你们把管大哥照顾好，我不能在这块呆下去了，以后准有再见面的时候。”说完就匆忙地走了。油灯下，爹的脸色象张白纸，鲜血满身，一动不动。我娘小心地替爹把血衣脱下来，只见全身血肉模糊，没有一处好肉皮。更叫人难过的是腰骨被打断了，左腿被打折了。没几天，我娘也急得病倒了。生活的担子，就落在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身上。两个姐姐、哥哥和我，每天带着一个破筐到处要饭，扒垃圾堆，拣煤渣。爹的伤口化脓，天天在发高烧。我二舅见到这个情景，急得火燎似的，他想借些钱给我爹买帖药，可是跑了几处都没借到。

## 被迫卖掉了两个姐姐

一天，二舅坐在炕沿上皱着眉头，唉声叹气。他沉默了一会儿，含着泪对我娘说：“姐，这样下去一家人不病死，也得饿死。”说到这，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娘说：“那有什么法子呢？”二舅颤抖着嘴唇说：“把亭送给人家，暂时过过关吧。”亭是我大姐的小名。当时，她只有十三岁，娘不忍心地说：“孩子还小啊！”二舅难过地说：“现在，顾大人的命要紧，得想办法弄帖药治治病啊！”娘再无别的路

可走，无可奈何，就叫二舅去张罗。

几天后，我家来了个五十来岁的老太婆，一进屋就问：“闺女上哪去了？”这时，我娘的心象刀搅一样疼，忍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这个老太婆见我娘哭得死去活来，就假慈悲地说：“大嫂子，别难过啦。你闺女就要跟我享福去了。”我年纪虽小，也懂得是怎么回事了，听了这话，就转身冲出家门，跑去找我大姐。远远看到大姐正蹲在煤灰堆里拣煤渣，我跑到姐姐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大姐，不好了，娘把你卖了。”大姐楞了半天，反问我：“你说什么？”我又说一遍：“娘把你卖给人家了。”大姐“呀”了一声，甩掉煤筐，拉着我的手，拚命地跑回家里，跪在娘的跟前，哭着哀求：“娘，我的好娘啊！你可不要卖我啊！咱们生就生在一块，死就死在一起，我可不能离开你们啊！”爹躺在炕头，难过得直捶胸。娘把大姐紧紧搂在怀里，牙齿磨得格格发响。一家人大哭了一阵子，娘才呜呜咽咽地对大姐说：“孩子，不是娘心狠，你想想啊，不为你娘，也为你爹和你几个弟弟。你爹没钱治病要疼死的，你弟弟没有吃的要饿死的，你明白了吗？”娘这么一说，姐姐止住了哭声，用两手擦擦满脸的泪水，望了望娘说：“娘，我明白了，我听娘的话，我走，现在就走……”亲骨肉就这样分离了。

卖了大姐只换来了八斗谷子。用七斗谷子买了三帖药，我们满以为三帖药就能把爹的病治好，谁知服完了药伤势还是不见好。剩下的一斗谷子对付了两个月，又没法生活了，只好又把二姐也卖了。打这以后，伺候爹

娘，照看弟弟，拣煤渣，拾垃圾，乞讨要饭，都是我和十一岁的哥哥的事了。

一天，我出去拣煤渣，跑了一天才拣了半筐。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就往家走。迎面走来两个牵着洋狗、挎着洋刀的鬼子，我赶紧跑到路旁土堆后躲起来，可是已经被鬼子发现了。他们走到我跟前，伸出脖子看了看，然后一脚踢翻了我的煤筐说：“你的小偷的干活。”说着一把揪住我的头发，一下子推到路旁的粪坑去。我全身淹没在里面，只露出了头，我受不了，拚命往上爬。鬼子放开两条大狗站在粪坑边汪汪狂叫，鬼子见了哈哈大笑。我气得故意在坑里乱扑乱打，粪水四处溅飞，臭味熏天，这鬼子才捂着鼻子，牵着狗走了。鬼子走远以后，我赶紧爬出来，跑到河边洗了个澡，拾起煤筐往回跑。

从此，我不敢再去拣煤渣，只得和哥哥一起拾破烂、要饭，受尽了侮辱和打骂。

## 母亲悲伤得疯了

就这样，我们苦苦地熬过了一个年头，我爹的伤势渐渐好转，自个儿能下炕慢慢走路了。可是，我娘受了这许多折磨，特别是因卖了大姐二姐，受到极大刺激，以致精神失常，疯了。经常深更半夜往外跑，对着星星和月亮，叫唤大姐、二姐的名字。有一夜，天空里雷电闪闪，眼看一场暴雨就要到来。这时，娘忽然又跑出去了。我和哥哥紧跟着追赶出去，却已经看不到她的人影了。我们边喊边

跑，到了村东河边，看到娘坐在土堆上失神地望着河面。我们跑到她跟前，搂住她的脖子，使劲地喊：“娘，回家吧，娘，回家吧……”可是娘好象没看见听见一样，一声不响。这时已经大雨滂沱，我们只好拽住娘的胳膊，把她拉回家。一路上，娘还拚命地喊着：“亭啊，环啊，我在这，别跑了，别跑了。”

我爹看娘的病越来越重，就想：换个环境也许会好些，于是便领着一家人开始了第二次逃难生活。

爹的病还没有好利索，就挑着箩筐，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盲目走着。我们走了两天，到了离抚顺七八十里路的东陵，刚刚走进村里，正在沿村要饭的时候，遇到一个约摸五十来岁的人。他身穿大褂，手拄文明棍，鼓着大肚子，摇头晃脑地走到我们跟前，端详了半天，才拉长嗓门问：“你们到这里干什么？”我爹说：“我们路过这里。”“噢，是逃荒的吧？”我爹又回答说：“是的。”这个人又问：“你们上哪去呀？有地方投奔吗？”我爹说：“没有。”“啊！这些孩子怪可怜的，应该找个落脚的地方啊。”我爹听了这番话，感到他很和善，就说：“我们是无家可归的人，是想奔活路出来的。”这个人滚动了几下眼珠子，问问我们家里人的年岁，用同情的口气说：“人总是要有口饭吃，有个窝住呀，你们实在无处可奔，就住在我这里，我先借给你们几斗粮食，帮我家干干活，秋后再给你们算工钱。”于是我们被领进一间场院的茅草棚里。

原来，这个人是本村占有三百多亩地的大地主，姓王。他家原来雇有七八名长工，我们来了没几天，王地主

就把三个长工辞退了。我爹天天起早贪黑给地主锄地，哥哥给他放牛喂猪，当个半拉子长工。这年庄稼丰收，王地主看到场院堆成山的谷子，高兴得合不拢嘴。可是却一直不提给我们工钱的事。

## 我被劫进了火坑

到了除夕那天，我爹忍不住了，就去地主家，找他算工钱。王地主正坐在屋里拨拉算盘，他明知我爹走进屋里，连头也不抬。我爹压住了火气说：“东家，你说过工钱到秋后算，我想给孩子添件衣服，今天就给算算吧。”话音刚落，王地主立刻暴跳如雷，气势汹汹地说：“我早给算好了。”说着抓起一册帐本扔过来叫我爹看。爹不识字，只得求他：“东家给我说说吧。”这个家伙说：“你还欠下我二石五斗谷子。”我爹以为没听真，就问他：“二石五斗谷子是怎么回事。”这家伙就又说了一遍：“你还欠我二石五斗谷子。”这时我爹还弄不明白，又问：“我们一家人干了半年，怎么倒欠你的粮呢？”这家伙又死样怪气地说：“你不是借了我的五斗谷子吗？这些日子，你们一家人，住我的房子，吃我的饭，走的路也是我的地，喝了我家井的水……算二石五斗粮，不是便宜了你吗？”我爹听了这话，肺都气炸了，一把拽住地主的袖子，怒气冲冲地说：“原来你是存心欺骗我们，让我们为你白干。”地主恼羞成怒，甩开我爹的手，连拉带推，把我爹推出门外，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当天晚上，王地主就带着狗腿子窜到我们家里来逼债。我爹指着破锅对他们说：“就这些玩艺儿，你看着办吧。”他们东张西望一番，知道逼不出什么东西来，就威胁说：“没钱还债，把二小子顶上，要不今天就给我滚。”说罢，走出去了。爹气得对着地主的背“呸”了声，站起来对我娘说：“这个鬼窝不是咱呆的地方，走，走……”可是，往哪儿走呢？这除夕的夜晚，地主老财们，张灯挂彩，酒肉满桌，可我们一家却老的愁，少的哭。我娘来到这里后，精神慢慢正常了一些，她想了想说：“他爹，还是让恩海去吧。”我爹也冷静地考虑了一下，觉得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也只得依了。当时我才十一岁，就成了地主家的小长工。每天晚上，只能躺下打个盹，就得爬起来挑水，扫院子，干零杂活。不等太阳出来，就又赶着十三头牛、两头毛驴上山放牧。

## 从虎口里夺回了我的一条命

第二年初夏的一天，我爹在一块苞米地里锄草，地主的儿子假装在地头玩耍，其实是在暗中监工。我爹没理那小崽子，干了一会，便坐下来休息。刚坐下来，忽然“嗖”一声，一块小石子正好打在我爹的眼睛上。我爹抬头一看，原来是那小崽子用弹弓打来的。接着，他又抓起一把土跑过来，往我爹脸上扔。这下，我爹火了，马上站起来，左手抓住小崽子的衣领，右手给了他一个耳光。由于用力过猛，小崽子被打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我爹一看事

闹大了，赶紧往回跑。我哥哥收工刚到家，见我爹脸色不好，忙问：“爹，出什么事了？”爹只说声：“不好了，走，快走！”边说边跑进屋里，起了锅，裹好被，用扁担一头挑一个，领着一家人逃走了。

这时，我还在山上放牛。等放牛回来，走进家里一看，屋里空荡荡的，东西都没有了。我大吃一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喊了几声：“娘——”没有应声。我急得倒在炕上大哭起来。忽然，“哐当”一声，王地主手拄着拐杖，气急败坏地闯进来，瞪着眼睛问：“你爹跑哪去了？”我说：“不知道。”他恶狠狠地说：“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爹跑了，还有你哪。”说着拽住我的头发，把我拉到牛棚跟前，用拳头朝我的脸打，打得我鼻孔的血象喷泉一样往外冒。接着他又拣起牛鞭抽打我，我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感到身旁暖烘烘的，睁眼一看，原来躺在一头母牛肚子旁边。我渴得想挣扎起来找水喝，然而身子一点也动弹不得。天快亮的时候，长工们下地了，他们经过牛棚，听到里边有呻吟声，走进来一看是我，吃惊地说：“哎呀，你在这里，我们以为你跟你爹走了呢。”长工张大叔说着就把我抱起来，骂道：“这个畜牲！竟在孩子身上下毒手。”长工们都气愤地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这孩子折磨死。走！去找王地主讲理。”王地主听见牛棚里闹嚷嚷地，就跑来问：“出了什么事？”大家说：“我们当长工的，只不过是穷，但也是人啊！你怎么能把这孩子折磨成这样子？你不把长工当人看，我们都不干啦。”当时，正是农忙季节，王地主见激怒了所有的长工，怕影响他收庄稼，就

装出一副慈悲相，说了一堆好话。这样，才算给我留下了一条命。

## 在五星红旗下骨肉团聚

正当我在苦海里挣扎的时候，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带来了光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抚顺解放了。我们劳苦人民拨开了云雾，见到了红太阳。解放后使我感到大快人心的第一件事，就是人民政府把残酷压迫我们劳苦农民的那个王地主判处了死刑。公审大会那天，我怀着满腔仇恨，上台控诉了这个恶霸地主迫害我一家的滔天罪行。当时，我心情的激动，真是无法形容，我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们，给我们撑腰，使我报了仇，雪了恨。可是，当我想起了爹娘的时候，心情又阴沉起来，我爹我娘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我们一家还能不能骨肉团聚啊？

一天，我开完会，刚从农会的大院里走出来，忽然有个身穿崭新棉袄的人，跑到我跟前，喊了声“哥哥”。我仔细一看，啊！正是我日盼夜想的弟弟。我惊喜地把弟弟紧紧抱住，问道：“爹娘在哪里？一家人都好吗？”弟弟说：“走，回家去，到家就全知道了。”弟弟拉着我的手赶到了火车站，登上火车，回到了抚顺，又把我带到市郊的一个村子。一进村，弟弟边跑边喊：“娘——哥哥回来了。”我娘从一栋高房大院跑出来。“娘——”我一头扑到娘的怀里，许多要说的话，这时一句也说不出，我只感到娘的

心在激烈地跳动，温暖的泪花不停地落在我头上。这是兴奋的泪花、幸福的泪花，是翻身奴隶对党对毛主席无限感激的泪花啊！娘把我慢慢放开，脸上浮现出我从未见过的幸福的笑容。

进屋后，我娘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菜馅馒头。可是，一家人悲喜交集，谁也吃不下去。我爹看着我们都没心思吃饭，便诉说起逃荒后的悲惨遭遇。

我爹从王地主家逃走後，领着一家人流浪在抚顺。天天睡在路旁，吃在街头。冬天的夜里，就在大官桥桥洞避避寒。这个桥洞里每天还有十多名无家可归的难民。抚顺解放后第三天，人民政府发现了这个情况，当天就把这些难民接到了难民安置所。接着，有病的送医院治病，无家可归的，就安置在郊区。我们一家就被安置在这个村里，分得房子和土地，我爹的病也在抚顺市医院治好了。爹越谈越激动，泪水簌簌地从他眼眶里流下来，最后他泣不成声地说：“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我们早就成了冻死鬼了，更不要说骨肉团聚了。”

一家人团聚后不久，我就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进入了抚顺第三工程公司工作，党培养我成了一名起重工人。

一九六〇年，我来到大庆，参加了开发油田的大会战。这些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哺育下，在大庆油田这个革命熔炉里，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锻炼，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连年被评为红旗手，一九七三年又被评为战区标兵。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同志们叫我谈感想,真是几天几夜也谈不完啊!在欢迎会上,我扼要地介绍了我的经历。对同志们说:当年连学校的门也不能进的放牛娃,今天进了大学,成了大学的干部,这不是简单的事,更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啊!我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好工作,和同志们一起把大学办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学校。

# 喜看油田翻麦浪

——大庆油田家属标兵薛桂芳讲家史

收获的季节又到了。我手握着镰刀，踏着纵横成行的田埂，眺望着一眼看不见边的庄稼，那密密麻麻的茁壮的麦穗，在阵阵和风中翻滚着金色的浪涛。我的胸中，也正象这滚滚麦浪一样，激荡着难以形容的喜悦。我们这些在旧社会受人践踏、受人凌辱的奴隶，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万年荒芜的草原上，不但打出了石油，也种出了庄稼。把我们新开发的油田，建成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想到这些怎能不使我感慨万端呢？

因为我们开荒种地取得了一点成绩，石油工业部发给了我们创业庄家属生产队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发扬穷棒子精神，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两句话，可真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是嘛！我们本来就是一些地地道道的穷棒子啊！现在虽然翻了身，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还是漫长的，艰巨的。我们继续前进，就必须坚持发扬穷棒子精神，这不仅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同时，也是为了防修反修，使我们能够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只

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不断前进，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每当我凝视着红色锦旗上的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字，多少难忘的往事就会涌现在我的心头。

## 地主害得我们家破人亡

我的老家在甘肃省酒泉县。一家人都给地主张学礼干活。爷爷在他家当了几十年的长工，在我四岁那年，由于他长期的过度劳累，得了弯腰驼背的伤力病，整天一大口一大口地吐血。在那个社会里，我们穷人哪有条件治病呢？得了病只好坐在家里等死。结果我们全家就眼巴巴地望着爷爷悲惨地咽了气。

爷爷死后，爸爸、妈妈、哥哥、连我这个刚满八岁还没桌子高的小姑娘，都到了地主家去干活，但还是过不下去。这一年，一连几个月没有下雨，地里的庄稼都旱死了。穷人没得吃，只好啃树皮草根，后来连山山洼洼的树皮草根也被啃光了，方圆几百里内，村村都横着饿死的尸体，大路上走着一群群逃荒的人，有的小孩脊背上插着一块出卖的木标，哪个爹妈忍心出卖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无奈留在身边也是饿死，卖出去也许还有活路。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爹妈也决定把我的小妹妹卖给人家。

一天，一个中年汉子赶着一头小毛驴来到我家，他交给我爸爸一斗谷子，冷冷地说：“准备好了吧？”妈妈一听，忍不住的泪水淌满了两腮。她用刚拿到手的谷子，给妹

妹熬了一碗稀粥，并看着她吃完，然后再给她洗了脸，梳了头，搂在怀里放声大哭起来。爸爸蹲在地上直喘着粗气，豆粒大的泪珠子簌簌地落在破衣袖上。领孩子的人要走了，妈妈流着泪哽咽地说：“孩子，不是妈妈不疼你，实在是养不活你呀……”爸爸尽管心似刀剐，但仍然忍着痛对人家说些好话，希望人家能够很好地对待妹妹。当那个中年汉子把妹妹抱上毛驴走出家门时，我们一家都放声大哭起来。妈妈忽然哇地一声从嘴里吐出了一口鲜血，昏倒在地上。

妹妹被卖掉以后，妈妈象害了一场大病似的，连走路都没有力气了，整天躺在床上叨念着妹妹的名字，一连三四天都一点东西不吃。但是，狼心狗肺的地主仍然不肯放过她。一天，张学礼派他的狗腿子刘二狗跑到我家，他一进屋便拉长着脸吼道：“快给八爷推磨去，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你倒躺在床上享清福！”说着便动手把我妈从床上拉了下来，推着往外走，妈妈扶着门框一步也不能走动。他看我妈实在不能干活，便骂了一声：“饭桶！”把我妈一脚踢倒在地上。妈妈被摔得喘不过气来，嘴里不停地往外吐白沫，这时爸爸不在家，我急得直哭，住在隔壁的叔伯嫂子赶忙跑过来，帮我把妈妈抬到炕上。嫂子想给我妈煮点饭，但缸里一粒米也没有。嫂子说：“你妈给地主家推了多少年的磨，为什么一粒粮食都不给，向他要去！”我就拿了一只破口袋，跑到地主家要粮食。地主的大老婆舀给我两碗米。我拿着米急急忙忙往家奔。回到家里，把米煮好，满满地盛了一碗送给妈妈，妈妈挣扎着爬起来，接过

碗来，刚刚放到嘴边，就猛地推给了我，头一歪又倒在炕上。我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就叫着：“妈妈，吃呀！”这时叔伯嫂子推门进来，一看我碗里全是谷壳子，一粒小米也没有，又看看我妈已经断了气，就忍不住地哭起来。嫂子一边哭，一边对我说：“地主给你的哪里是米呀！全是谷壳子，你妈妈气死了呀。”我听嫂子这样一说，手中的碗啪地一声掉在地上，扑倒在妈妈身上也大哭起来。

不料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妈妈死了不久，我的大弟弟因饿极了，吃了地主地里几根菠菜，被地主的狗崽子打得脖子上鲜血直流。为了封住伤口，邻居们帮我找到一张兔皮，把兔毛剪净，贴在弟弟脖子上。过了几天，伤口没好，溃烂得更厉害，而且生了很多蛆虫。弟弟经常疼得在地上打滚，嗓子也哭哑了。后来又有人说杏仁能治这种伤，我又到处找杏仁，用嘴嚼碎敷在弟弟的伤口上。就这样，过了两个月总算封了口。可是，一件更大的灾难又临到我们家里。在地主张学礼家扛活的哥哥，被狗地主打伤了，由于伤势严重，没来得及回家就死在地主家的牛棚里。爸爸又心疼，又气愤，象疯了似的，跑去和地主讲理，地主不但不认错，反而说哥哥死在他家，冲了他家的财神，要我们杀猪宰羊，为他家冲“丧气”。爸爸顶撞了几句，又挨了狗腿子们一顿毒打，连气加伤，差一点送命。

## 在玉门油矿的苦难岁月

我一把血，一把泪，给地主张学礼家整整做了十年丫

头。这时，我已是十八岁的姑娘了，但穿的衣服还遮不住身子。爸爸看我年龄不小了，就给我找到了婆家，我结了婚。有钱的人家结婚，穿绫罗，坐花轿，还有七骡八马驮着陪嫁。我们结婚非但一无所有，连身上穿的干净衣服也是借来的。我的丈夫是在一个名叫张龙官的地主家里当长工，我们结婚后，我也给张龙官家干活。张龙官夫妻俩的心肠，和张学礼一样狠毒，动不动就是鞭子抽，鸡毛掸子打，或者拳打脚踢，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遭他们的毒打。这种折磨实在受不下去了，我丈夫就逃奔到玉门油矿。丈夫走后，我的日子更难过，不久也带着两个孩子找到了矿上，在矿场附近的一个破窑洞里住了下来。



解放前玉门油矿工人住的窑洞

谁知天下纵有千条路，可就是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在玉门油矿，丈夫在矿上当苦力，我就给油矿的经理徐奇洗衣服，做针线。那时候，物价象飞的一样狂涨，我累死累活替他洗一天衣服，拿到的钱，顶多能买一斤米，过了一夜，就只能买一棵葱了，从来吃不上一顿饱饭。肚子整天饿得咕咕响，没办法，我只得抱着孩子到西山采猪巴拉草。因为这种草干燥，肚里没有油，孩子吃了拉不下屎来，只得让大人用手往外抠，有时因为干得厉害，孩子被抠得哇哇直叫。那段时间，我们就靠猪巴拉草和发霉的苞谷面过日子。可是，连这种苦日子也没有过多久，就又遭到了新的灾难。

一天，孩子他爸下班回来说：“徐奇生了孩子，工头要我们工人凑钱送礼”。我说：“咱们连嘴也顾不上，哪里还有钱送礼？”

我们正在说话，工头张生财领着几个人来到我家。我还以为他是来催缴礼物，便站起来说：“你看看这一家大小，连嘴都混不上，拿什么送礼呢？”他手一摆，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家的礼免了！不过，经理的孩子没有奶吃，你得到他家去喂孩子。”我看着床上瘦得皮包骨头的小男孩，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自己的孩子怎么办？再说家里也离不开呀！”张生财见我不肯去，便把手一挥，一群打手一拥而上，拉着我就往外走。我又是哭，又是喊。孩子他爸气得跟他们讲理，反被他们踢倒在地上。我被拉到徐奇的家里，徐奇挺着大肚皮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地说：“薛桂芳，你不要不识抬举，叫你来，是看得起你，懂

吗？”等他说完，张生财就把我强拉到一间小屋里。

关进了徐奇的这座高楼深院，我插翅也飞不出去啊！没办法，只得在徐奇家里呆下来。过了半个多月，有一天，我站在徐奇家的门口上，望着我家那个破窑洞。望着望着，忽然看见我的丈夫阴沉着脸，怀里抱着一件东西，手里拿着铁锹，朝着荒滩走去。后边跟着两个孩子又哭又喊。我的心猛地一跳，立刻就明白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我什么也不顾了，发疯似地推开守门的狗腿子，也向那片荒滩奔去。等我跑到那里的时候，我的小男孩已经埋在土里了。我的丈夫和两个大孩子正围在那小小的坟墓旁边痛哭。我真象万箭钻心一样，说不出心里是什么味道。我可爱的宝宝，我永远不能再看见他了，我怎么能舍得了啊？不，我还要再看他一眼！现在还来得及啊！我拿起铁锹，把这新筑的小坟刨开，又看见了小男孩那可爱的小脸，他嘴巴里还咬着一个小手指头呢！这说明他的小肚子饿的难过啊！我心疼地昏倒在地上，半天才哭出声来。我真想一头碰死在这荒滩上，离开这个万恶的黑暗社会吧！可是，当我看到身旁站着两个孩子，看到他们的潦倒憔悴的爸爸，我的心又软下来了。我不能死，为了他们，我还得活着！

死了儿子的悲痛，日日夜夜地绞疼着我的心肠，我坚决不再到徐奇家去了。徐奇看我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怕我喂不好他的孩子，也不要我了。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不幸的事。一天下午，我正在屋里缝补衣服，忽然听见有人喊道：“打伤人了！打伤人了！”我放下针线活，跑出去

一看，只见几个工友气喘吁吁地抬着一个人走过来。走到跟前，我才认出是孩子他爸，当时我几乎又昏倒在地上。

工友们把孩子他爸放在炕上，告诉我说：在快要下班的时候，工头叫工人们把一根钻廷抬到另一个新的井位上去，这根钻廷有几千斤重，没有吊车，靠人力怎能抬得动呢？无奈工头硬是逼着大家抬。工人们没有办法，只得十个人一组抬着钻廷。孩子他爸抬到中途，步子稍慢了点，皮鞭就向他抽来，他一个踉跄，钻廷的一端正好压在他身上。我听完了工友们的叙述，数不清的旧恨新仇，一起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失去了理智，真的发疯了，我连丈夫的死活也不顾了，拔脚就往外奔，一口气奔到了徐奇的家里，要和这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家伙算账。徐奇见我象疯子一样，就冷冷地说：“你又干什么来了？”我说：“你害死了我的儿子，打伤了我的丈夫，我要和你算账。”徐奇瞪着一双绿豆似的眼睛，反咬一口说：“谁害死了你儿子？谁打伤了你丈夫？你不要无理取闹呀！”他说完，就喊了一声：“来人呀！”于是从对面走来了几个“黑狗”，要把我拉出来，我忍无可忍，一头向徐奇撞去，忽觉脑子“轰”地一下，便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耳边朦朦胧胧听见孩子的叫声：“妈妈呀，妈妈呀……”我想抬起头来，但不知怎的，头好象有几百斤重似的，怎么也抬不起来，勉强挣扎着把眼睛睁开，“这是在哪儿？”我看看四周，慢慢才认出是在徐奇“公馆”的门外。两个孩子看我从昏迷中醒来了，就把

我扶了起来。我用手摸了摸头，头上粘糊糊的都是血，这时我才明白：我被“黑狗”打伤以后就被扔在门外。没办法，我只得被两个孩子搀扶着，踉踉跄跄地回到了自己家里……

## 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一九四九年九月，正当我们一家眼看没法再活下去的时候，平地一声春雷，玉门解放了！解放以后，我们得到了彻底翻身，人民政府给我们安置了房子，并把孩子他爸送到医院去医治，伤好后，又回到了矿上工作，孩子们也都进了学校。

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豢养的反动经理徐奇以及其他一些双手沾满工人鲜血的坏蛋，都受到应得的惩罚。在我的家乡，欺压剥削农民的地主张学礼、张龙官等也都被打倒了。旧社会灾难不断，新社会喜事重重。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找到了那卖出多年的小妹妹。我们姐妹见面，悲喜交集，要讲的话，几天几夜也没有讲完。但千句话、万句话，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不是毛主席、共产党，那有我们的今天？

一九六〇年的春天，我国为了加速石油工业的发展，挫败帝修反联合反华的阴谋，在祖国的北疆，组织了夺取大油田的石油大会战。我们一家就随着浩浩荡荡的石油大军，从玉门油矿来到了这里。当时正当国家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工地的粮食供应比较紧张。为了争取早

出油，工人们日日夜夜奋战在井架林立、钻机轰鸣的工地上，业余时间还到野外去捡黄花菜充饥。我见到这种情况，心中很不平静。心里想：石油工人为了坚持会战，打出争气油，忍受着多大的困难啊！我们家属也有两只手，为什么不能开荒种地打些粮食支援大会战呢？于是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向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可是，有些家属，对这件事情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她们有的不相信妇女有力量能够开荒种地，说：这荒地自古以来就没有种过庄稼，把荒地变成熟地，我们这些妇女既没力气，又没经验，能让荒地长出粮食来吗？有的家属因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光是家务就忙得团团转了，哪里还有精力去开荒？”有的甚至说：“过去职工进矿，家属进城；现在不进城，住上这干打垒，已经够意思了，还要开荒种地，没听说过。”听了这些话，我越发觉得组织家属开荒，不仅有着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这样，我的决心更大了，就挨门挨户的访问，耐心地进行宣传动员。我想光是用嘴巴空讲还不行，要以实际行动做出样子，只要我们带头干起来，一定会有人跟着赶上来的。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我联合了四个和我志同道合的姐妹，成立了“五姐妹开荒小组”。

这年四月的一天，我们姐妹五人，扛起铁锹，背着孩子，向开荒地点出发了。尽管一路上风沙刮得我们睁不开眼睛，遍地的乱草树根阻碍着我们迈出脚步，但阻碍不了我们开荒的决心。我们一边走，一边相互鼓励，共同背

诵着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六里荒滩，我们足足走了两个半小时。到了目的地，只见那里还有钻井队留下的一座破屋架，我们就利用这座屋架，用借来的旧帆布，搭起了帐篷，又从附近背来些干草铺在地上，当作床铺，开始了开荒生活。白天，我们下地垦荒；夜里，在煤油灯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虽说这时已经是春天了，但东北的荒原上，仍是寒风刺骨。满布草根的土地，冻得象水泥地一样坚硬，用铁锹翻地，只干了一会儿手上就磨出了血泡，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但由于大家决心大，意志坚，人人精神抖擞，没有一个人叫苦。

正象我们预料的：我们五姐妹开荒的消息，传遍了油田，不久就有十八名家属要求参加我们的小组，于是我们开荒的队伍由五人扩大到二十三人。

当然，在开荒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我们没有力气，没有技术，没有经验，而且也缺少工具。例如：在播种的时候，我们借到了一副木犁，但没有牲畜，怎么办？我们想铁人王进喜在没有吊车的情况下，组织大家人拉肩扛，终于把几十吨重的钻机搬到井场，把井架安装起来，我们就不能用人拉木犁吗？于是我们就抽出十人，采取一人扶、九人拉的办法，在没有牲畜的条件下把地犁好。艰苦的条件，繁重的劳动，考验着每一个人。在我们开荒队伍中，也有少数年轻的姐妹，没有受过这样的艰辛，加上孩子的拖累，思想上也曾有过波动。我发现了这个情况，就组织大家回忆对比，控诉旧



大庆油田家属标兵薛桂芳

社会对妇女的迫害，畅谈新社会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年轻的姐妹们听了都难过的哭起来。她们说：比起旧社会，我们这点苦算得了什么？何况我们在旧社会受苦，是替富人做牛马；今天我们艰苦奋斗，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这样，我们经过一番艰苦奋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使荒地长出了庄稼。第一年，我们开了三十二亩荒地，收了几千斤粮食，几万斤蔬菜。

一九六三年，敬爱的周总理视察了大庆油田。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大庆的实际，提出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矿区建设方针。大庆油

田党委遵照周总理的这一指示精神，决定按照油田的分布情况，建设分散的工农村，实行亦工亦农。领导上根据油田党委的统一规划，要我带领一批家属，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开荒种地，建立新型的居民点。我接受了这个光荣任务，就和大家来到这里，建立了“创业庄”。就在这时，党批准了我的要求，我加入了党。党组织让我担任创业庄家属生产队的指导员，我说：“请党放心，我能挑一百斤，决不挑九十九。”我们创业庄建立以来，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做出了一定的成绩，领导上马上就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就在这一年，我们创业庄的家属生产队，被评为油田的标杆单位，石油工业部的首长，亲自授予我们一面红旗。

特别使我们兴奋的，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七日，毛主席的光辉的《五·七》指示发表了。毛主席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是对我们大庆家属的最大的鞭策，最大的鼓舞。

忆往昔，看今朝，我经常激动得热泪直流。在旧社会，我为地主、官僚做牛做马，忍受着他们的鞭打和凌辱。今天，我为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到处受到人们的尊重。我曾到北京参加纪念“三八”节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向中央首长汇报我们建设新型矿区的成绩；也曾乘飞机到祖国各地，向兄弟厂矿的同志们介绍我们的经验。一九六五年，我当选为安达市的副市长。如今，我又被选为大庆党委委员，大庆妇联主任，和同志们一起

管理着矿区的革命和生产。这真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啊！

我深深懂得：解放前后我们国家所出现的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才取得的。我们今天享受到幸福，决不能忘记过去的痛苦，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提高革命警惕，保牢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

# 童养媳顶起半边天

——大庆油田采油六部一大队家属陈福光讲家史

我开完了党支部大会，夜已经很深了。还没走到家门，远远就望见我家的窗口，还亮着灯光。我很奇怪，这么晚了，怎么孩子们还没有睡觉？等我走进屋里，只见大女儿正伏在桌上，书写《愤怒揭发“四人帮”反革命滔天罪行》的批判文章。我拿起来就读：

“……‘四人帮’是一伙地地道道的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表面上装成革命的样子，暗地里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妄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重新骑在我们劳动人民的头上。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这个石油工人的女儿，就会象妈妈一样，给地主老财做牛马，当童养媳，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读到这里，数不完的仇恨啊，象江河的怒涛一样，又在我胸中奔腾翻滚。一幕幕的往事，重现在我的眼前。

## 灾荒吞噬了爸爸的生命

我老家在四川省南充县。在我出生的那年，家乡闹

灾荒，粮食颗粒无收，全家四口人只好吃野菜，啃树皮。爸爸吃野菜中了毒，浑身浮肿。由于没钱医治，我们含着泪，眼睁睁地望着爸爸活活病死。

爸爸死后，妈妈不得不带病到地主家里当佣人。从早干到晚，挣来的钱不够一家糊口，晚上回来，还得点起油灯纺棉花，一纺就是大半夜。妈妈累死累活地干，身体越来越坏了，成天咳嗽，脸色苍白。那时我年纪小，一饿光知道哭，我哪知道，每哭一声都是在揪妈妈的心啊！

一天，我在家饿得受不住，就拚命地哭。哥哥怎么也哄不好，只得把我寄托到邻居谢大娘家里，到地主家去找妈妈。哥哥在地主家的厨房里找到了妈妈，她正趴在灶口一把一把地往锅底添柴。哥哥上前拽着妈妈的衣襟说：“妈，小福光饿得直哭，我哄不好。”妈妈看看哥哥急得简直要哭的样子，而自己又不能回去，没有办法，就从灶上的淘米箩里拿了两块锅巴，用破菜叶子包上递给哥哥说：“拿回去哄哄妹妹，可别再往这跑了。”哥哥答应着走出门外，刚到门口，忽然一条大黄狗张着嘴扑了过来，地主的儿子跟在后边，只见他两手叉腰，歪着脑袋叫唤着：“小花子，偷了我家啥东西，你还想跑？”哥哥朝前凑了几步，挥着小拳头说：“谁偷东西？你叫唤啥？”地主儿子慌了，就喊起来：“小花子偷东西了，小花子打人了！”这时，狗地主邓玉石就从屋里窜出来，一把拽住哥哥的头发，往墙上来回地撞。地主婆也跳出来骂着，并把那两块锅巴打掉在地上。哥哥被打得头晕眼花，就拚命地喊：“妈妈快来呀，妈妈快来呀！”妈妈闻声赶到，只见哥哥倒在地上，满头是

血。妈妈一下子扑到哥哥身上，心疼地叫着：“孩子呀，孩子！”妈妈愤怒地问狗地主：“你们凭啥打我的孩子？你们真比狼还狠哪！”狗地主见妈妈骂了他，蹦得老高，嚷道：“反了！反了！”说着就命令狗腿子把妈妈拖走了。哥哥爬起来追上去，被地主一脚踢倒地上。

## 哥哥被迫进虎口

妈妈挨了他们一顿毒打，并被赶出了门。于是就领着哥哥挖野菜，拾柴禾，纺棉花，替人家干点零活，苦熬了一阵。到了哥哥十四岁那年，听邻居说，镇上张胖子店里缺个卖饼子的。妈妈明知张胖子是个大地主，大恶霸，又是有名的吝啬鬼，但想想去了总比在家挨饿好，就让哥哥去了。

哥哥到了张胖子那儿，每天天不亮，就背着饼穿山越岭地去卖，一跑三四十里，路上饿了就啃口红薯，渴了就喝河沟里的水。晚上回来，还得受张胖子的盘问。

一天，哥哥起早去卖饼子，遇到一队国民党的伤兵，一个家伙端着枪走过来喊道：“站住，筐子装的什么？”哥哥回答说：“饼子，到镇上去卖的。”这些家伙听了嘻嘻哈哈地说：“好极了，老子肚皮都饿瘪了，慰劳慰劳吧！”说着就象恶狼一样扑上来抢饼子。哥哥拚命地护住筐子不放。这些家伙就举起拐杖把哥哥打倒在地。七十多个饼子被他们一抢而光。

晚上，张胖子听说哥哥丢了七十多个饼子，就把哥哥

吊在树上，叫狗腿子们用皮鞭狠命地抽打。一声鞭响，一道血痕，都在哥哥的心里记上了一笔血帐。妈妈闻讯赶来，一看哥哥被打得遍体鳞伤，又气又痛，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拽住张胖子问：“你凭什么打人？快给我把孩子放下来！”张胖子板着面孔，冷冷地说：“没那么容易，拿钱赔上饼子就放人！”妈妈听了这话，气得浑身发抖，不顾一切地一头朝张胖子撞去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在一旁的乡亲们，也都指责张胖子不该把孩子打成这样子。张胖子见势不好，只得溜之大吉。妈妈含着泪求乡亲们帮着把哥哥背回到家里。

张胖子心狠手辣，他把哥哥打成这个样子，还不肯罢休。没几天，张胖子就领着一队国民党匪徒把我家团团围住。妈妈正在纺棉花，一看不好，忙叫哥哥藏起来。这时几个国民党匪徒已经砸开了屋门，张胖子闯进来，揪住妈妈问：“你的儿子呢？”妈妈说不在家。张胖子哼了一声说：“给我搜！”这些家伙乱敲乱砸了一阵，就把哥哥从一间放破烂东西的小屋里拽了出来。妈妈扑上去抱住哥哥，一个匪徒举起枪托朝妈妈头上猛砸，妈妈昏过去了。他们拚命地把哥哥往外拖，哥哥一面挣扎着，一面喊道：“福光啊福光！快看看妈妈呀……”

## 乱石滩上哭妈妈

哥哥被匪徒们拖走了。妈妈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我扑到妈妈身上哭喊着：“妈妈，快醒醒，哥哥被抓走了，快

去救哥哥呀！”妈妈猛然睁开眼睛，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想朝外走，一只脚刚刚抬起来，就又跌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妈妈倒在床上，不能起来。那年我只有七岁，就不得不跟着邻居去讨饭，挖野菜，拾柴禾。乡亲们这家送碗米汤，那家送只糠饼，就这样，我和妈妈勉勉强强地没有饿死。可是，妈妈的病却一天比一天重了，从脚开始慢慢地肿到了上身。妈妈知道自己不行了，有一天，叫我把邻居谢大娘叫来，挣扎着对谢大娘说：“谢大娘，我不中用了，我死后福光就劳你照顾了……”我听了妈妈的话，泪水如泉涌般地流出来，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你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扔下我可怎么办哪！”妈妈大口地喘着气，颤抖地说：“妈妈的病不能好了，往后要好好听谢大娘的话，记住咱家的仇啊！”说完就闭上了眼睛。我扑在妈妈身上又哭又喊。乡亲们含着泪水用一领破席子把妈妈的尸体卷起来，埋在荒野的乱石滩上。这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第二天一早，就哭着跑到乱石滩上，想去看妈妈的坟墓，不料妈妈的土坟已经被野狗扒开了，妈妈的尸体也被野狗撕碎了。我心象刀搅一样，顿时痛倒在地上，打着滚放声哭喊起来：“妈妈呀妈妈，我苦命的妈妈呀……”我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万籁俱寂的乱石滩上，只回响着我一个人的哭喊声。

## 从孤儿到童养媳

妈妈死后，谢大娘就成了我的亲人。她让我跟她住

在一起。但大娘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人，我怎么能连累她呢？这样，不久我就含着眼泪到伪甲长唐贵云家当童养媳。

进了唐家就象进了牢笼。一天到晚有干不完的活。白天上山拾柴，打猪草，锄地，扫院子，喂猪，做饭，背孩子。晚上剥猪菜，纺棉花。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口就骂，动手就打。说我前世作下罪，造下孽，是什么“丧门星”，把一家人都克死了。他们拿这些鬼话污蔑欺骗我，要我相信自己命里注定该做他唐家的牛马。

一天晚上，我做完饭就去剥猪菜。剥到深夜，困得上眼皮跟下眼皮直打架，一不小心，砍到了手上，把手砍了个大口子，连骨头都露了出来。我痛得捂着手在屋里跺着脚团团转。狠心的唐刁婆听不到剥菜的声音，就闯进来，拿起掸子，劈头盖脑地就朝我打。还咬牙切齿地骂：“死不了的贱骨头，这些猪菜剥不完，你就别想睡觉。”说完就走了。我只好忍着痛一只手剥着。一直剥到鸡叫，我还没有闭闭眼，唐刁婆就叫了起来：“做饭去！”我只得又去给他们做饭。

又一次，隆冬的一天早上，凛冽的北风卷着鹅毛大雪下个不停。他们逼着我去地里拔萝卜。我穿着妈妈留下的破衣裳，光着生满冻疮的脚板，每走一步，都象刀扎一样难受。住在萝卜地边的王大娘看我冻得直打哆嗦，就偷偷地招唤我进屋暖和暖和，还热了一碗菜粥端给我。我躲在门后，守着火盆，双手捧着那碗还冒着热气的稀粥，眼泪扑扑簌簌地流到碗里，心里想：只有穷人疼爱穷人啊！

唐贵云的老婆远远地透过玻璃窗，见我不在地里，料定是到王大娘家去了，便气呼呼地奔到王家，见我正在喝粥烤火，气得她吹胡子瞪眼，朝着火盆猛地踢了一脚，火炭崩了我一身，脸上、手上、脚上一下子烫起了泡。我气极了，也不顾一切地朝她撞去，把她撞倒在地。这下可惹恼了她，她爬起来，顺手抓起一根木棍就狠命地打我。王大娘急忙上前抓住木棍不放，大声说：“你们唐家也太狠了，这么小的孩子，成天把她当牛马使，还想咋的？你们咋不光着脚出去拔萝卜呢！”唐贵云的老婆见王大娘替我说话，气急败坏地喊道：“你管不着！她是拴在我槽上的小毛驴，我愿怎么使就怎么使，愿怎么打就怎么打。”王大娘气得把唐贵云的老婆推出门外，关上门。唐贵云的老婆在门外，一边跺脚一边骂：“小丫头，等回家剥你的皮，要你的命。”叫骂了一阵，气呼呼地走了。王大娘把我搂在怀里说：“福光啊！唐贵云和他老婆两个狗东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还是躲躲吧。”我怕连累大娘。大娘说：“我不要紧，你只管走吧！”往哪跑呢？我想了半天，决定先到舅舅家去躲几天。舅舅家离这里十几里路，王大娘给我找了双破鞋子，又给披了一件破衣衫，我就偷偷地出了大娘家，跑到舅舅家。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就找上门来，二话没说，拽起我就往回拖，舅妈一看不好，也跟到了唐家。唐贵云这家伙竟当着舅妈的面，把我打昏在地。舅妈气愤地和他们讲理，却被他们赶出了大门。

我在唐家就象在油锅里一样，一天一天地煎熬着。第二年唐家盖房子，雇了很多木匠、瓦匠。这些老师傅们见

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没命地干，还要挨打挨骂，心里非常不平，有时说几句公道话，好几次还因此和唐贵云吵起来。有一天，唐贵云叫我磨四十斤苞米面，我只磨二十斤，他就不由分说，揪住我的脖领子，打了我几巴掌，接着又一脚把我踢进了阴沟。阴沟里的屎尿垃圾沾得我浑身都是，头上撞了个大口子，鲜血和屎尿粘糊糊的弄了我一身。这些师傅们气不过，就纷纷说：“这孩子起早贪黑的干活，有什么不是？怎么能下这种毒手？”唐贵云这家伙不肯示弱，竟傲慢地说：“这是我家的人，你们少掺和。”这一下可惹恼了大家。师傅们马上动手收拾工具，说：“我们看不下去，不干啦。”唐贵云见工人们当真要走，又慌起来了。马上露出笑脸，说了些好话，还拉这个、拽那个的，并许愿说多给工钱。可是，师傅们却态度坚决地说：“就是一天给一个金元宝，我们也不给你这种人干活。”说着就都走了。唐贵云和他老婆垂头丧气地瞅着那盖了一半的房子，脸色象死了亲爹一样的难看。而我却高兴地心花怒放，从来还没有这样解过大恨。

## 翻身不忘阶级苦

一九四九年，革命的红旗插遍了全国，我的家乡解放了。社会起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穷人，彻底翻了身。昔日的奴隶，成了国家的主人。那些骑在我们头上的地主恶霸，有的被斗倒了，有的被镇压了。党和人民政府把我从唐贵云的魔掌中救了出来，我

这个童养媳获得了人身自由，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而且得到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并被乡亲们推选为村的妇女会主任，成了改造和建设新农村的一名干部。不久，我结了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一九六〇年，我和我的丈夫，响应党的号召，从祖国的西南，来到了祖国的东北，参加了夺取油田的石油大会战。当时，我心情的兴奋，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这些被人踩在脚底下的奴隶，竟成了征南战北的建设者，为挫败帝修反的阴谋而贡献力量。一路上，我胸中洋溢着革命豪情。到了大庆，当时辽阔的北疆草原，还是一片荒芜，条件十分艰苦。但当我们想到我们正在从事改天换地的伟大事业，就浑身是劲，再苦再难也不在眼里。我丈夫在工地前线头顶青天，脚踏草地，日日夜夜奋战，我就和姐妹们一起开荒种地，搞好经济生活。我们决心把大庆油田，建设成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

翻身不忘当年苦。我们这些翻了身的穷苦妇女，经历了新旧社会的两重天下，亲身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使我们得到解放和幸福。这几年来，这里虽然也有人刮妖风，放毒雾，但在这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始终紧跟着党，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党是和我们穷苦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啊！我并常常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因此，当我看到大女儿以我们劳动人民的苦难史，写出了批判“四人帮”反党罪行的文章，心里是多么欣慰啊！

# 工农的好后代

——大庆油田“身残志坚的好青年”张秋银的家史

“呜——”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火车开动了。张秋银站在车门口，眼里含着泪花，挥着手说：“同志们，请你们放心吧，我一定要战胜疾病，争取早日返回战斗岗位，同你们一起抓革命促生产……”

张秋银的坚强的声音，愉快的笑容，在隆隆前进的车声中渐渐消失了。前来送她上车的领导和同志们，都还伫立在月台上，久久不动。阴沉的天空正落着丝丝细雨，他们的衣服被雨水淋湿了，但都仿佛没有觉得，因为大家正为这个年轻姑娘的不幸而心情沉重着。

多么好的姑娘啊！她来到大庆虽然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而她的行动却处处给人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大家都称赞她是一个铁人式的好工人，工农的好后代。现在，这个铁人式的好工人不幸得了骨癌，病情正在不断恶化。张秋银知道了自己的病势严重，精神仍然那样饱满，情绪仍然那样乐观。对自己的工作，仍然那样热爱，那样负责。就在她去京治病临行的前一天，还不肯离开她的战斗岗位，把机泵和门窗上的玻璃擦得透亮，把地板拖得净

光，还端端正正地写好了一份思想汇报交给了党。

这个只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为什么能以这样正确的态度对待革命事业、对待自己呢？这首先要从她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中寻找原因。

## 难熬的苦难岁月

张秋银的老家，在山东省嘉祥县(今鄆城县)赵土屯。爷爷给地主赵永富家打短工，过着吃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就在张秋银的爸爸六岁时，饥饿和劳累夺去了爷爷的生命。爷爷死后，生活更加难熬了。年仅十岁的伯父，就去给一个姓杨的地主打短工。八岁的爸爸给地主赵永富家放猪，说是放猪，事实上放牛、放马、烧火、扫院子、端尿盆，什么都得干。当初讲定：爸爸给他放一年猪，要给一斗高粱的工钱，还要管饭吃。可是，狠心的赵永富，把剩饭喂猪，也不给爸爸吃。有一天，爸爸饿着肚子放了一天牲口，晚上回来，抓起一把猪食就往嘴里填。赵永富看见了，拿起马鞭就是一顿毒打。爸爸从小就很倔强，他大声质问赵永富：“你凭什么乱打人？”赵永富看爸爸不吃硬，还敢顶他，更冒火了，挥舞着皮鞭，直打得爸爸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转眼到了春节，赵永富一家人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可是爸爸迎来的却是一场灾难。这一天，天下着大雪。爸爸放了一天牲口，回来后，赵永富嫌背回的草少，一口咬定爸爸偷懒，不由分说又是一顿毒打，皮鞭象雨点一样落

在爸爸的身上，直到打累了，这家伙才住了手。爸爸披着破麻袋片，蜷缩在猪圈里，浑身痛得不能动弹，心里想：在这里，狗地主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这样下去，连命也要送掉，决定离开这吃人的魔窟。他忍着伤痛，咬着牙，慢慢地用手支起身子，一步一步地扶着墙走到大门，轻轻地用手开了门闩，逃出了虎口。回到家里，奶奶看赵永富把爸爸打成这个样子，心象刀搅的一样难受，奶奶把爸爸搂在怀里，心疼地说：“孩子，家里再穷也不让你去受这份罪了……”赵永富看爸爸跑了，就扣去爸爸一年的工钱，爸爸白白的遭了一年罪。

一年年的盼，一天天的熬啊！奶奶盼着能熬上个好光景。但是，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灾难却一个接着一个。

## 人间地狱的血泪

日本鬼子侵占我国东北以后，疯狂掠夺我国的煤矿资源。为此，他们豢养了一伙走狗，到处诈骗贫苦人民为他们出苦力。有一天，一个自称“王先生”的人，来到张秋银的家乡，说去东北能找到工作，能赚大钱。这家伙窜到张家，看着张秋银的爸爸，油腔滑调地说：“到抚顺煤矿挖煤，一天能赚一块金票，还给白面馒头吃。”爸爸想想没有别的办法，就对奶奶说：“在家也过不下去，不如到抚顺，或许能找到一条活路。”奶奶叹着气说：“那就去吧，可要多留心哪！”这样，爸爸就和一帮穷乡亲跟着那个“王先生”来到了抚顺，开始了苦难的矿工生活。

日本鬼子统治下的抚顺煤矿，是个人间地狱。矿工们在低矮潮湿的小煤窑里，在工头和狗腿子们的皮鞭下，一天要干十六小时的活。二百来斤重的煤，一天要背十五、六趟，每趟都要爬三、四十个阶梯，经常碰得满头是血疙瘩。一天，爸爸背着煤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着，突然，轰隆一声，一大块煤从上面掉了下来，爸爸眼前一黑，连人带煤滚到煤窑里，昏过去了。工友们把爸爸抬回工棚，半天才醒过来。第二天，矿工们都上工了，工头穆仁义见爸爸受了伤，不能再为他们卖命了，就领着一个背枪的鬼子兵来到工棚，一进屋就对爸爸喊：“你装死不上班，今天我看你的脑袋硬不硬。”话音未落，木棒便朝爸爸的额头打去，鲜血从爸爸的头上往下直流，爸爸又昏过去了。鬼子一挥手“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的不要紧。”说完就把爸爸拖进一个采完了煤的废煤窑里。矿工们都知道：凡是病了或受伤不能再干活的工人，都往这个废煤窑里扔。进去后，不给水喝，不给饭吃，更不给治疗，就是叫在这里等死。每天拉尸队都要从这里往外拉人，很多人甚至还没断气，就被活活拉出去扔进万人坑。

爸爸醒过来，一看被丢到这里，又气又怕，怕被丢进万人坑，就咬咬牙一步一步地向工棚爬去，爬着爬着，爸爸又昏倒在半路上。晚上，路过的工友们下工看见爸爸昏卧在路边，急忙把他抬回工棚。在工友们的照顾下，爸爸的伤有了好转。工头见爸爸没死，就天天逼爸爸下窑背煤。爸爸心里明白：再这样呆下去，不是累死，也得活活被折磨死，干脆逃出这个鬼地方。就这样，在一个漆黑

的夜里，爸爸逃出了抚顺煤矿，又回到了山东老家。

## 家破人亡的惨剧

爸爸逃回山东，来到了家中一看，那座低矮阴暗的小草房已经坍塌。听乡亲们说：奶奶去世了，伯父被地主逼得不知去向了。爸爸坐在倒塌的小屋边哭得死去活来。后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把这间小屋草草修理了一下，总算有了个安身之地，每天东奔西跑，找点零活做做，混口饭吃。过了一段时间，爸爸同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结了婚，第二年生了大姐，又过了两年生了二姐。在那个年月里，穷人家多一口人，就象头上压上了一座山，加上连日下大雨，黄河泛滥成灾，穷人不要说吃饭，连野菜和树皮也没得吃了。二姐没奶吃，长得又小又弱，一岁半还只能扶着墙站起来。

为了生活，爸爸和妈妈出去给人家做活，就把二姐一个人扔在家里。二姐从屋里爬到屋外，饿了没东西吃，就吃沙子和土，渴了就喝冷水。这样，不满二岁的二姐就得了痢疾。家中穷得无法糊口，哪去弄钱给孩子治病啊！二姐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妈妈含着眼泪说：“孩子他爹，得想个办法了，不能眼看着孩子等死呀！”爸爸一横心，把全家仅有的一床破被子拿到集上去，想卖两个钱给二姐治病。可是，有谁要买这种破被子呢？有钱的人，自然不会要这补丁摺补丁的破棉被，而穷人连饭都吃不上，想买也没有钱。爸爸一直等到散集，也没有卖出去，不得不拿着

破被子回来。爸爸回到家里，从妈妈怀里抱过二姐，可是二姐闭着眼睛一声不吭，爸爸叫着二姐的名字，喊了好几声，她才用很大劲睁开眼睛，小嘴抽动着，爸爸把二姐递给妈妈，冒着雨跑到地主家玉米地里掰回五穗玉米，爸爸刚进屋，二姐已经离开了人世……

## 阶级教育的力量

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张秋银的一家结束了苦难的历史。爸爸回到了抚顺煤矿，当上了新中国的矿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也找到了失散多年并且也当上了矿工的伯父。

爸爸和伯父一见面，就流着泪互相倾诉了离别后的遭遇。爸爸抚摸着小秋银的头说：“秋银啊！我家祖祖辈辈，就是这样在苦里生，苦里死，苦熬了多少辈子，熬到了天亮，得到了幸福，可不能忘记过去所受的苦啊……”

张秋银出生在这种苦难的家庭里，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在家庭里经受着深刻的阶级教育。进入学校以后，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下，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参加了政治运动。因此，她虽是在甜水里长大的，但也深深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懂得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懂得只有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劳动人民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青年人参加工作，不是为了个人的出路和前途，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捍卫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

张秋银怀着这样的目的，于一九七二年九月来到了大庆，她被分配到石油化工总厂催化车间轻油泵房当泵工。她深深感到：自己能在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大庆红旗下，在铁人战斗的地方，当上一名石油工人，是多么的幸福。她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向铁人学习，做个铁人式的好工人。

张秋银一到工作岗位，就虚心向师傅和同志们学习，努力工作，抢着干脏活、重活。和老工人一样，以革命加拚命的战斗精神，大干社会主义。但是，就在这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情临到她的身上，她得了骨癌。起初，虽然左臂已经开始疼痛，她还以为是过度劳累了，没有意识到是生了病。在那段时间里，为了把机泵上的旧漆除掉，再喷新漆，张秋银用锤子不停手地敲打机泵，白天敲不完，就夜里接着干，时间长了，感到左臂疼痛，她就换右手敲，后来右手也顶不住了，怎么办？张秋银想起老一辈的工人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决心以铁人为榜样，咬紧牙关，坚持干下去！

后来张秋银的左臂抬不起来了。为了不让同志们发现，她尽量背着大家干活，用一只手干两只手的工作！尽管如此，她的左臂不好，不久还是被大家发现了。同志们劝她去医院看病，她总是满不在乎地说：“哪有什么病？即使有点小病怕什么！”有时疼得厉害了，就去医院要点止痛药吃吃，医生开给她病体诊断单，她放进口袋里，不拿出来，仍然照常工作。有一次，张秋银用两手去开阀门。感到左胳膊钻心的疼痛，豆大的汗珠，从头上往下直淌。

这时被一位领导同志看见了，劝她马上到医院去，她不听，领导只好下命令把她强行送进医院。经过检查，她被诊断为骨癌。于是党组织决定送她去北京治疗。

## 为革命与疾病斗争

在北京日坛医院，经过病理切片检查，根据她的病情医生认为必须马上截肢。当医生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张秋银以后，这个刚强的姑娘，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但她所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得失与安危，使她痛苦的是，不能再象以前那样为革命事业拚命地战斗了。她对医生说：“我是个炼油工人，祖国需要油，世界革命需要油。我刚参加工作不久，还没有为党和人民做什么，党和人民需要我做的工作很多，你们要想办法让我回到工作岗位呀！”

医生虽然被张秋银火样的革命热情所感动，但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能不亲切地对她说：“小张，你的心情我们很理解，根据你的病情，截肢正是为了让你有机会更好地为党工作啊！”听了这话，张秋银含着泪感激地望着医生，坚定地说：“只要我还能为社会建设添砖加瓦，你们截肢吧！”

手术后的第二天，张秋银的神志完全清醒了。她想到在旧社会里二姐生病没钱医治活活死在妈妈怀里的悲惨情景，今天自己得了病，党把自己送到北京治疗……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多么幸福啊！就是活上几十年，拚上几十载，也报答不完党的恩情啊！

怀着这样的心情，手术后的第三天，张秋银就用一只手支着身体，一点一点往床下挪着。刚截过肢的伤口，一动弹疼得难以忍受，浑身直冒冷汗，连衣服也湿透了。张秋银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终于挪到了床边。但两脚一着地，眼冒金花，全身发抖，身体失去了平衡，向一边倒去。护士正赶到，一把扶住她，将她按到床上，劝她不要着急。

张秋银为早日返回战斗岗位，同疾病斗争的顽强精神，深深感动了护士，也就热情地帮助张秋银慢慢地锻炼。在护士的帮助下，张秋银走几步歇一会再走几步，坚定的革命意志使张秋银终于摆脱了护士的帮助，一个人下了楼走到医院的花坛，又从花坛走回了病房。这一天，张秋银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碰上人就象传送喜讯似地说：“我很快就可以回大庆了！”

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和她顽强锻炼，张秋银能够独立料理生活了。她用一只手穿衣服，打水刷碗，还经常给病友们端菜送饭、打洗脸水，协助医护人员照顾病员。一位老大娘激动地说：“你们大庆工人，真是个个都象王铁人哪！”

手术后的第七天，张秋银的刀口拆线了。医生为了减轻她的疼痛，用汽油浸润胶布。张秋银闻到汽油的芳香，就好象回到了大庆，回到了石油化工总厂，回到了泵房。张秋银在医院里再也呆不住了，由于她一再要求，只在医院住了十九天就出院了。

出院后，领导和同志们遵照医生的嘱咐，要让她在家

休息六个月。但是，在休息期间，她一次又一次地向领导要求到厂上班。尽管她嘴唇都要磨破了，领导还是不同意，强迫她在家休息。可是，这个胸中燃烧着革命烈火的姑娘，又怎么能够安安静静地躺在家里呢？张秋银又一次去找领导要求上班。她说：“我可不能再等了，我的生命是有限的，我要在这有限的的时间里，抓紧为党多做些工作。”张秋银哭着恳求领导，她要求工作的迫切心情，使领导同志流下了热泪，同意了她的要求。但是，考虑到她剩下一只胳膊，不适应泵房的工作，就决定让她在办公室工作。张秋银却坚定地说：“我失去了左手，决不能伸出右手向组织要照顾！我要把失去左手带来的损失，用右手夺回来。”就这样，张秋银休息了三个月后又回到了轻油泵房。



张秋银(左)因患骨癌截了左臂之后坚守泵房干革命

上班以后，张秋银用一只手练习开关阀门。开始一段时间，感到胳膊又酸又痛。但是，她不顾一切顽强锻炼，很快就能用一只手灵活的开关阀门了。

有一天，张秋银一个人顶岗，突然310泵垫片弛开了。大量的液态烃喷了出来，整个泵房充满了液化气体，如不及时排除，就有爆炸起火的危险。在这紧急万分的时刻，张秋银奋不顾身，投入排除故障的紧张战斗。她用一只手，一会开这个，一会关那个。浓烈的液化气味熏得她头昏脑涨，胳膊又酸又痛，但是，她想到爆炸起火所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就竭尽全力，坚持战斗，直到别的同志赶到了，协助她一起排除了故障，避免了一次严重事故。

## 活一天就要战斗一天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是张秋银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张秋银站在毛主席的像前向党宣誓：“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活一天就要革命一天，战斗一天。”就在这一年，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团委授予她“模范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一九七五年四月，大庆党委又授予张秋银“身残志坚的好青年”的光荣称号。她说：自己为党并没有做多少工作，而党却给自己这么大的荣誉。从这以后，张秋银越发忘我的工作。不久，她的癌症又扩散了。

一九七六年元月，大庆党委、石油化工总厂党委第二次将张秋银送进了北京日坛医院。由于病情恶化，所

有药物对她都已失去了作用。她意识到继续治疗已经无效，她想：不应该再浪费同志们的精力和国家财产了，因而一再要求出院。党组织坚决不同意，但她从此拒绝用药了。癌症末期疼痛是十分难忍的，张秋银常常疼得昏了过去，医生几次要给她用药，组织也多次做工作劝她用药，但她说啥也不肯。她说：“这些贵重药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吧，我是共产党员，我能挺得住！”看着张秋银忍着剧疼，把嘴唇都咬破了，病房里的同志都难过得哭了。张秋银为了不使大家过于悲伤，竟强忍着痛苦，拿起歌本，指着《纵情歌唱伟大领袖毛主席》这首歌对大家说：“来，我们一起唱这支歌好吗？”人们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同张秋银唱起歌来。这歌声飞出窗外，飞向四面八方，鼓舞着正在战斗的人们！

# 爸爸寄来的活教材

——大庆油田采油四部青年工人任军谈家史

我来到大庆的这年冬天，接到爸爸从天津寄来的一只邮包，从提取包裹的邮单上，知道是一件棉衣。我想：爸爸知道这里的气候很冷，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吧？可是，等我拆开邮包一看，原来是件染满了血迹的破棉袄。棉袄的里、面，是由二十四种颜色的二百八十多块碎布拼成的。看到了这件破棉袄，使我非常惭愧。看！我们这些在甜水里长大的年轻人，脑子里所想的，和那些苦大仇深的老年人是多么不同啊！

说起这件破棉袄，对我并不陌生。我在家里的時候，爸爸就一次又一次地拿出来，讲述这件破棉袄所反映的苦难时代和我们的惨痛的家史。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故城县穆村。爸爸童年时代，一家四口（爷爷、奶奶、爸爸和叔叔），就靠爷爷给地主扛活。有一年的冬天，爷爷病倒在床上。一天下午，地主的狗腿子闯进我家，逼着爷爷去给地主扛粮食进仓。奶奶上前说了一声“他在病着，起不来啊！”就被狗腿子一脚踢倒在地，接着就把爷爷拉走了。爷爷到了地主家里，硬撑着把

一百多斤重的麻包背起来，刚迈了两步，麻包就滑下来了。狗地主在一旁看到，扬起鞭子就抽，爷爷挣扎着，两只冒着火的眼，愤怒地瞪着狗地主，这家伙就更加凶狠了。他暴跳如雷地吼着：“反了！反了！”一边骂，一边又扬起鞭子狠命地抽打，打得爷爷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当时爷爷穿的就是这件破棉袄，遍体的伤口，把棉袄的里、面都染得血迹斑斑。从这以后，狗地主就把爷爷一脚踢出了大门。

爷爷忍着疼痛、艰难地走回家里。刚满三岁的叔叔，哪里懂得爷爷此刻的痛苦心情呢！看见了爷爷，就哭喊着“饿啊！饿啊！”这时爷爷就象万箭钻心。心灵的痛苦，比皮肉的痛苦更为难忍啊！爷爷以痛苦而又慈祥的目光，望着哭喊着“饿啊！”的叔叔，又看了看冻得正在发抖的爸爸，止不住的泪水，从眼眶里簌簌地流个不停。爷爷就这样呆呆地望了半天，猛然把棉袄脱下来披到爸爸身上，然后走出了家门，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刚满十岁的爸爸接过了爷爷的破棉袄，同时也就接过了爷爷所挑的生活担子，到了一个地主家里，给地主喂猪。其实，哪里只是喂猪！从早到晚干不完的活。地主的牛马牲口还有休息的时候，爸爸却连觉也没时间睡。贪得无厌的狗地主还嫌干的少，每天不是打，就是骂，没有一天太平日子，有时被打得鼻嘴流血，有时被打得皮开肉绽。于是，这件碎布拼成的破棉袄，旧血迹又添上了新血迹。但这已是两代人的血迹啊！

爸爸十四岁那年，离开了这个狗地主的家，跑到天

津，求亲告友，总算进了一家工厂当学徒。满指望到了工厂生活会好一些，哪里想到：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里，穷苦人民跑到哪里也没有生路。一进厂就先立“保单”，讲明工伤病死一律不管，挨打挨骂不能吱声……这哪是什么“保单”？简直是“卖身契”啊。在这个厂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笨重活，但却吃不上一顿饱饭。爸爸的脊背压弯了，十几岁的少年从此成了驼背。爸爸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生活，终于逃出了这个象牢狱一样的“囚笼”，流浪街头，挖野菜、拾垃圾、当报童……这样饱一顿、饿一顿地整整熬了二十二个年头。这件破棉袄，破了补、补了又破，跟着爸爸度过了二十多个隆冬。

全国解放了，党把千千万万的穷苦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人民政府给爸爸安排了工作，进入了天津市的电机局。爸爸脱下了这件破棉袄，换上了新工服。这件破棉袄就成了对我们一家进行阶级教育的活教材。

我来到大庆，成了新中国的石油工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冬天还没有到来，厂里就发下了和暖的棉工服。爸爸为什么又把这件破棉袄寄来呢？难道还叫我再穿它过冬吗？当然不是。爸爸寄来这件破棉袄，包藏着深远无穷的意义啊！

是叫我看到这件破棉袄，就能想起过去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斗争的觉悟，不能高枕无忧！

是叫我看到这件破棉袄，就能想起旧社会的种种罪恶，更加热爱新社会，激发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是叫我看到这件破棉袄，就能想到世界上还有很多

人过着爷爷和爸爸当年所过的苦难生活，从而把眼光放远，立志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终生！

.....

.....

这件血迹斑斑的破棉袄，虽然没有写上洋洋万言，但它所给我的教育却是如此深刻，这是因为爷爷和爸爸早就为我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明白了爸爸的意思，就给爸爸写了回信，表示决不辜负爸爸对我的期望，一定会在党的领导下，在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的道路上，永远前进！